

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

簡銘宏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觀看，具有一種解構文本的沉默力量。文本裡符號的位置與其聚集軌跡，既可反映相對應的知識體系，讓書寫的思維理路得以浮現。進而，透露作者意圖的所在。因此，憑藉符號的觀看，能透視文本的內部運作與架構，覺察到不同學科的話語流動，呈現另一種的詮釋面貌。緊扣在文本的歷史環境背景下，觀看〈臨床講義〉的符號展示，藉以闡釋蔣渭水的寫作策略與文化改造論述，再現〈臨床講義〉書寫的意指。

〈臨床講義〉特有的臨床診斷書格式，及其符號本身的多重意指，交織出醫學、文學與政治三者之間的互文性。例如，病患身份的基本資料，在符號置放效果的營造下，能呈現政治性寫作的協商過程，並指涉其隱喻。進而，透過擬人論的台灣，在病態與健康的身體敘事下，反映過去的文化記憶、脫離世界文明時間的停滯現狀，以及擘畫體質改造後的活力未來。

除此之外，在身體語言的表徵上，蔣渭水其醫師與社會運動者的雙重身份，使得文學語言與生理器官、病理症狀的身體敘事，能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並製造文學文本中一種虛擬與想像的遊戲結構。進而，指涉蘊含政治意圖的申論性話語，顯示〈臨床講義〉對於身體與疾病隱喻的書寫特色。

關鍵詞：蔣渭水、臨床講義、隱喻、身體敘事、符號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及修改建議，使本文觀點更趨圓融和合理。限於本文篇幅空間，部份修改建議，只能另文撰述。文中的漏失和誤引等，則為筆者的責任。

An Interpretation of Jiang Wei-shui's “Clinical Lecture”

Chien Ming-Hung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oyin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imposes silent deconstructive forces on the text. The appearance and trajectory of the signs in a text reflect corresponding body of knowledge and disclose the logic of writing, showing where the author's intention may li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reveals the internal working and structure of a text, exposes the language flow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enables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play of signs in “Clinical Lectur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ex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Jiang Wei-shui's strategies of writing and theory of cultural reformation and to re-present the intention of writing in “Clinical Lecture.”

Written in the special genre of clinical medical record and containing in-text signs that have plural reference possibilities, “Clinical Lecture” demonstrates the intertextuality of medical scie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For instance, via the working of signs,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 can point to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in political writing and create metaphoric references. Consequently,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Taiwan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body in illness and well-being reflect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past, departs from the stagnancy in time in world civilization, and imagines the energetic future after the betterment of the physique.

In addition, Jiang Wei-shui, as both a doctor and a participant in social movements, is able to employ the language of the body to combine the lan-

guage of literature with narratives of the body that describes bodily organs and pathological symptoms. Thus, he creates in literary text a virtual and imaginative game structure. This paper shows how such combination enables a reference to argumentative language with political intentions in the text and reveals the working of metaphoric body and illness in “Clinical Lecture” as a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Keywords: Jiang Wei-shui, Clinical Lecture, Metaphor, Narratives of Body, Sign



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

一、前言

為了宣傳大正10年（1921）10月17日剛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以當時通用的國語（日文）撰寫〈臨床講義〉這篇體裁形式新穎、語彙通俗白話的文章，並發表於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刊物《會報》第一號，文末落款為「大正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錄，隨著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同時進行了文化協會《會報》的發行計畫。原本預計在大正10年11月28日發行，印刷了一千兩百本。依照當時出版規則，須事先呈報。然而，卻因〈臨床講義〉內文，將「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比喻臺灣；另一篇〈惱める魂〉創作，視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描述；以及〈岡山郡より〉此文，嚴厲批評一些諂媚份子對台灣的行政當局謳歌奉承等語句。台灣總督府根據以上諸文觸犯了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禁忌，進而把台灣文化協會當作激進的危險機構等。因而，原訂大正10年11月28日發行的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遭受禁止處分。經過文字的修訂處理後，遲至大正10年12月10日，以《會報》第一號改訂版來發行流通。¹

從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這段記錄來看，〈臨床講義〉的原始版本，應見於大正10年11月28日發行的《會報》第一號，然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審查後，必須要改正修訂。〈臨床講義〉的第二版本，應見於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改訂版，可是，目前無法看到。現在所能見到〈臨床講義〉的較早版本，為昭和6年8月5日（1931）蔣渭水病死後，由蔣渭水大眾葬儀委員會提議組成「蔣氏遺集刊行會」，由黃師樵和白成枝編纂，在昭和7年（1932）3月完成的

1 「會報の發行」：「從（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時，就開始進行文化協會的機關報——『會報』的發刊計畫。大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印刷了共一千二百本的『會報』第一號，依據出版規則提出申請。『會報』登載記事，以『臨床講義、關於名為台灣這位患者的說法』為題の記事裡，把台灣比喻為『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等等的字句，同月三十日受到禁止發行的處分，十二月十日發行改訂版。」。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臺灣社會運動史》（日本東京：龍溪書舍，1973），頁147-148（原書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14年）。

《蔣渭水全集》。²

在昭和7年的《蔣渭水全集》裡，〈臨床講義〉即為日文漢字的篇名。其副題為〈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即「關於名為台灣這位患者的說法」）。³其餘〈臨床講義〉的日文版本，尚有民國39年（1950）白成枝再編的《蔣渭水遺集》。⁴其他現行的中譯版本，則散見在台灣光復後的報紙與他人的著作。⁵

本文，以近代醫學的演變、日本近代思潮的更迭、蔣渭水與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等〈臨床講義〉文本的相關人物言行，作為文本的理解背景。據此，進一步聚焦〈臨床講義〉內文的文字符號及其深層的表徵。本文使用的〈臨床講義〉，以昭和7年（1932）《蔣渭水全集》的日文版本為主，並參考民國39年（1950）白成枝再編《蔣渭水遺集》的日文版本、以及其他的中譯本。⁶

本文想要探討的是，蔣渭水以醫師與社會運動者的雙重身份介入了〈臨床講義〉的創作場域時，他如何利用書寫的權力與策略來進行符號的置放，方能突破當時政治的禁忌與監控，標識出台灣總督府最忌諱的民族意識？除此之外，觀看醫學、文學與政治等不同學科的面向，在臨床診斷書的寫作格式下，如何展現彼此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並藉由身體語言的表徵，以診察台灣自身的文化弊病？透過現今理論的多元詮釋，說明〈臨床講義〉除了可診斷社會的病態症狀與打造接軌世界文明的理想體態外，實際上，〈臨床講義〉的書寫，是一種文化抵抗的寫作策略。蔣渭水想要藉由書寫〈臨床講義〉，為台灣指示一條種族生存競爭下的未來航向。

2 《蔣渭水全集》，未付前即遭警察沒收，僅流出兩本。一本為黃師樵所藏，今已亡佚。另一本為戴國輝於臺北市舊書攤所購，於西元2002年由戴國輝夫人林彩美女士贈予蔣渭水家屬後人全集影本。請見〈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文後說明，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06），頁702。

3 在昭和7年的《蔣渭水全集》這篇〈臨床講義〉的原文圖檔，可見於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12），頁47。

4 白成枝編輯，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發行，《蔣渭水遺集》（台北：文化出版社，1950），頁93-95。

5 例如，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出版社，1993.06），頁98-99（作者於該書頁139的註3裡，說明此篇的中譯本是引自「白成枝編《蔣渭水遺集》，台北，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頁94-95」）；彭峰先翻譯（莊永明提供），《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1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18；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03），頁203-205；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頁3-6（編者於文後註為《蔣渭水遺集》，傅力譯）等。

6 這裡的中譯本，指的是註5所列舉的翻譯文章。

二、權力的符號／符號的權力

(一) ○○的符號

觀看，具有一種解構文本的沉默力量。文本裡符號的位置與其聚集軌跡，既可反映相對應的知識體系，讓書寫的思維理路得以浮現，進而透露作者意圖的所在。因此，憑藉符號的觀看，能透視文本的內部運作與架構，覺察到不同學科的話語流動，可呈現出另一種詮釋的面貌。

漢字符號的外在形式，端賴圖畫線條與聲音組合的能指（signifier）來展現，而蔣渭水基於作者的書寫權力，在〈臨床講義〉文本的符號操作中，佈置了豐富的所指（signified）。如果說書寫是文字符號一種意識性置放活動的話，那麼〈臨床講義〉文本裡符號的擺設及其組合順序，除了可呈現出蔣渭水的寫作風格外，並能指涉深藏其文本中的意識形態。

如前言引述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處分記錄所言，「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這段話，讓大正10年的台灣總督府頗為忌憚，致使〈臨床講義〉內文必須要改訂處理，才能獲得殖民當局的核准發行。所以，大正10年12月10日發行的〈臨床講義〉，出現在台灣社會的讀者面前，應該有「原籍○○○○○○○○○○」這段的變動現象，即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記錄所說「改訂版」的處理情況。⁷這意謂著當時台灣總督府基於殖民政權的穩定，嚴密監控有關台地人民思想言行的出版物，對於社會過激危險的言論，透過審查處分的機制，將刊物文章的字詞、語句，予以抹除或切割的編輯處理，再利用不具語義的符號取代原有詞彙的位置，製造出閱讀視覺上的空白。這種編輯處理，具有視覺感官被遮掩與閱讀理解產生障礙的效果，意圖破壞文章的原意，導致作者向讀者傳遞的訊息，出現中斷或不完整。這種審查的暴力處置，顯示出大正時期台灣總督府開始擔心日本內地民主思潮（デモクラ

7 可能為「食割」的編輯處理。「食割」這個日文漢字，原本為昭和時期「軍國主義」獨裁統治的象徵。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頁200。但是，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這段記錄，對照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在〈大正十年（1921年）十二月七日〉的日記記述中，關於《臺灣青年》雜誌為何獲得東京的發行許可，卻在台灣遭受禁售的處分來看，大正10年台灣總督府當局的審查機制，早就介入台灣刊物的出版和發行，已經有脅迫修訂處理的情形。田健治郎，〈大正十年（1921）十二月七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史研究所，2006），頁404。

シー)⁸可能波及台灣的社會秩序，因而必須祭出防治的措施。⁹

從日本帝國憲法的角度來看，明治28年（1895）因應台灣新附地的獲得，賦予台灣總督獨攬特權的「律令」。¹⁰即使後來，以「敕令」代替「律令」的委任立法修正案，即「法三號」。¹¹台灣人民並沒有隨著大正8年（1919）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倡導「內臺一體」、「同化主義」的口號，完全實現了《日本帝國憲法》〈第二章臣民權利與義務〉「第二十九條 關於日本臣民在法律的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的自由」。¹²因此，「原籍」下的「○○○○○○○○○○○○○○○○」符號，既是總督獨裁權力展現的能指形式。¹³同時，更深層的意涵指向於，日本始政以來，一直強調著台灣殖民地有別於日本內地的風俗、習慣、語言、宗教等特殊性的，¹⁴卻與田健治郎總督時期（大正

-
- 8 從大正元年至大正5年（1912-1916）期間，日本內地民主思潮，正如火如荼展開。日本內閣在藩閥政治逐漸淡出之際，順勢推動了符合世界自由民主潮流的政黨政治。此大正民主思潮時期，最具特色的是「民主主義」運動。這一運動，與主權在民的民主主義相似，由大正5年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雜誌，提出打破日本社會傳統階級劃分的主張。此運動極受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的歡迎，也吸引了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注意，間接影響了台灣島內要求與內地國民待遇地位平等的想法。請見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編著，〈第三章臺灣留學生的活動〉，《臺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87.04），頁77。
- 9 這種台灣總督府認為有害台灣社會秩序和諧的過激思想，必須防堵的想法與措施，可以印證於大正10年12月7日田健治郎總督對林呈祿和蔡培火解釋，《臺灣青年》在台灣禁止發行的談話：「然在京學生多傾民主思想（デモクラシー），欲直移入之於台灣，除依教育普及漸次促進外，用急激之手段有大擾亂民心之虞，是為台灣民眾所不採。如有思想擾亂之恐之文書，亦不許發賣也。」，《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404。
- 10 在明治29年3月，第九回帝國議會上，當時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水野遵義答覆議員關於台灣施行「法律第六十三號」的質詢，足以代表著台灣總督專權的特殊性：「憲法之於台灣，雖不能施行其全部，但政府之所見，則儘其可能行者而行之。即如憲法上之天皇大權，固與主權之移動，同時行於臺灣。而其他憲法第二章以下，如所謂臣民之權利義務者，於實際上未能行之，是故有宜與之總督以發有法律效力之律令權之必要」。請見林呈祿，〈六三法的沿革〉，《臺灣青年》1卷5期，大正10年7月。
- 11 明治39年，以「法律第三十一號」代替「法律第六十三號」，兩者性質接近，只是效力期限延長至五年。請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1989），頁5。
- 12 伊藤博文，《帝國憲法皇室典範義解》（日本東京：金港堂，1889），頁53-54。
- 13 大正10年12月7日田健治郎總督對林呈祿和蔡培火的談話，可見台灣總督權力對台地思想言論的專擅：「一、臺灣與內地異人情、風俗及文化程度，故內地所許，台灣有不容者；內地所不容，台灣有許者。故假令內務省容認之者，若於臺灣認有害治安者，斷不許發賣也。二、凡文書含離間內地人與臺灣人，使臺灣人對內地官民起疾惡之念，如傷兩者之感情之意者，在內地雖無招何等惡影響之虞，在台灣有大害治安之恐，斷不許發賣也。」，《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404。
- 14 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民政長官（西元1898-1906）後藤新平所謂「鯛の目と比良目の」（即「鯛魚的眼睛與比目魚的眼睛」）的生物學原則，即在「尊重在地的風俗習慣」，最能夠說明這種確立殖民地特殊性的治理概念。請見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第1章台灣民政長官〉，《正傳·後藤新平》3卷（日本東京：藤原書店，2004），頁53。

8年10月至大正12年9月)台灣總督府倡導漸進同化的殖民思維,有所矛盾和糾葛。因而,這種法制上的衝突與殖民管理思維的矛盾,產生了殖民論述的操作空間。¹⁵

觀看蔣渭水同樣發表在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的〈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其中一段文字「因為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¹⁶也是印證了「○○」的暴力。其他,如〈治警事件法庭辯論〉這段話「臺灣人不論怎麼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¹⁷因法院審判時開放旁聽,蔣渭水一行被告於公共場所的答辯,在爆滿的台灣民眾監督圍觀下,¹⁸台灣總督府不能即時干預,也無法事後以「○○」遮掩「中華」的存在。甚至,蔣渭水直指「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讓這幾個漢字符號爆發出民族意識的能指與所指,終於名正言順地揭開「○○」的真面目。「○○」,即是「中華」符號隱藏的所在。那麼回復〈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被遮掩語句的原貌:「所謂的台灣人,是中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這不過是,蔣渭水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兼具種族與國民不同身份的事實。然而,在總督田健治郎極力推動同化主義期間,眾多○○符號的展現,不啻為逆抗大正民主思潮(デモクラシー)下台灣總督府專制暴力的圖像。反面襯托出「○○」原本要遮蔽的文字,正是忤逆台灣總督權力意志的表徵(representation),作為一種抵抗同化主義的符號。

15 田健治郎在大正8年11月12日接任台灣總督,對台灣總督府各機關首長官吏的訓話:「前九時,依第一公式行列登廳。少憩後,臨於會議室,對臺北各衙局課長以上及憲兵隊長,述關臺灣統治之大方針,訓示要在教化臺灣人醇化融洽,令為純粹日本人。」。請見田健治郎,〈大正八年(1919年)十一月十二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史研究所,2001),頁62。日後,大正13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法庭辯論〉也指出台灣總督府殖民治理觀念的前後差異:「這同化主義,在台灣卻由田總督時代發明的治台方針。田督以前,像後藤長官時代,投莫大的經費設立舊慣調查會,而教育以無方針為方針。對這兩件事,就可知田督以前的台灣統治,是全沒有確定的方針和政策。」,《臺灣民報》2卷16號,大正13(1924).09.01。

16 本篇〈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內文,為林伯欣翻譯。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6。

17 蔣渭水,〈治警事件法庭辯論〉,《臺灣民報》2卷16號。

18 觀審的詳細情況,請參閱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臺灣文獻》17卷1期(1966.03),頁84-86。

回到〈臨床講義〉，內文「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這幾個符號，因台灣總督府權力干涉而被○○遮掩。這些漢字外形的符號，究竟具有什麼想像或力量，讓台灣總督府如此謹慎處理？換個角度來看，蔣渭水如何藉由「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展現出符號本身的權力，作為蔣渭水抵抗同化主義的寫作策略呢？

（二）台灣的姓名／未來

姓名，可以標識個人的特殊性，並作為區隔他人的符號。個人的獨特性與其生活史的存在訊息，可以統攝於姓名這符號之下。宏觀來看，地理位置、國家名號或種族稱謂等，這些被命名符號的由來及語義，也能在歷史、社會、民族等框架中，得到陳述或解釋。從〈臨床講義〉的「姓名」到「素質」等條列來看，顯然地，台灣集體化約為虛擬人格的病患。如果說蔣渭水藉由患者的基本資料而想要建立台灣的生命史，首先必須為「臺灣」這個化約符號，建構一套完整的詮釋。那麼整篇〈臨床講義〉的文本場域，即是透過文學語言隱喻後，呈現出「臺灣」生命史的病歷效果。因此，文本的意指，實在發軔於「臺灣」這個符號。

蔣渭水在病歷的「姓名」條列下，填寫「臺灣島」這個地理位置的標誌符號，賦予「臺灣」這位病患一種自由游離的性格，¹⁹ 隱然撤除了明治28年（1895）馬關條約協商產生的政治強制性。進而指涉「現住所」，只是隸屬

19 自從十六世紀葡萄牙、西班牙三桅帆船，相繼穿越麻六甲海峽後，台灣這個島嶼隨即也揭開了亞熱帶蒸鬱繚繞之後的神秘。不管是「小琉球，或是美麗的島嶼」（*Lequeo pequeno*、*Hermorsa*或*Formorsa*），都為外來者的航海經驗中，對這個東洋針路航線上的地理位置，標識他們借用或稱呼的符號。十七世紀，循著西班牙人足跡而來的荷蘭船隊，終於踏上當時被稱*Tayoun*的這塊土地。然而，追逐物質交易的閩粵華人，早已給予她另一個名字「東番」或「北港」。不斷被命名的稱呼中，歷經二百餘年的時間長河，在西元1895年再度褪下「臺灣府」、「臺灣省」的名號。另一個對她覬覦已久的東洋統治者，終於貼上其所有權名字——「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對台灣名稱的詳細論述，請見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1582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翰林社會天地》5期（2006.10），頁4-13；「臺灣島」是一個指示自然地理位置的標識符號，尤其在地圖的繪製上，具有堅固性質的能指外殼。不同時期外來的發現者、佔領者，總是對這個地理位置，使用本國的語言符號，予以命名或作為所有權的政治性展現（*performance*）。然而，統治權的更迭，使得政治命名的符號，在自然地理位置上，僅獲得短暫的顯現。相對於政治符號的短暫性，自然地理的標識符號，得以自由穿透歷史文本屢次的拘束。

歷史文本裡數次政治遷徙中的片段。換言之，「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雖為當時的政治實況。但是，「現（いま）」的語義及形式，正表徵著時間的斷裂性、碎片性，隱喻整個歷史的流動裡，「臺灣」不可能被日本帝國永久禁錮（統治）。因此，與上句「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的聯結並列下，除了彰顯台灣未來的預設想像與過去曾經的存在外，並能驗證「現住所」，只不過是一種具有暫時性的語詞。所以，台灣總督府以「原籍○○○○○○○○○○○○○○○○」的改訂處分，強迫遮蔽原有符號的政治色彩，避免洩露其所指。這樣一來，「○○○○○○○○○○○○○○○○」就能視為象徵權力的符號。

不過，當時的台灣未曾被中華民國統治過，蔣渭水卻將「中華民國」列於「原籍」的條列下，應為符號的刻意操作，揭露一種文學語言的預設作用。除此之外，「中華民國」置放在「福建省臺灣道」之上，排擠掉「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的現時位置，更強調「原籍」字義的忠實性，隱現出「和／漢」民族的差異性，反映了「現住所」在政治事實與身份認同之間的弔詭（paradox）。²⁰

就後殖民理論對語言符號的重置論述，這句「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鑲嵌（inscribed）閱讀理解下的一種間隙（gap）。²¹ 即為並列兩個語言符號，它們卻是互為相似文化的接續。進而，利用符號與符號之間的交接面，刻意製造歷史時間的銜接效果。一方面做為文化區別的對照標示，另一方面是對歷史文本的再創造（nachbildung）。直言之，就是利用語言符號的置放現象，透過符號本身的權力，作為一種政治意圖的操作策略。「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這兩個符號的間隙，隱晦著「漢」這個符號。因為「漢」這符號本身，具備強烈民族意識的鮮明形象，容易傳達民族的差異性與

20 Bhabha, Homi K.: 「過去的被殖民人民、當今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居住於一個『文化之間』的世界，於矛盾的和衝突的傳統中創造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們同時『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身陷於文化翻譯的動盪而痛苦的過程之中。」。Bhabha, Homi K., 'A Global Measure', presentation on the "Forum on Postcolonialism"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June 2002.

21 所謂間隙（gap），意指「藉著發展特定的方式，既構設文化距離，亦同時把距離聯結起來」，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65。

其歷史記憶，不利於當時台灣總督府大力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及其醇化臺民的政策。就當時世界思潮的演變來看，²²這也是台灣總督府極力抗拒和防堵，大正7年（1918）歐戰以來，因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十四點和平原則而激發的民族自決，鼓動列強所屬殖民地走向自治或獨立，所引發的不安局面。²³

雖說「原籍○○○○○○○○○○」，不過是隔絕民族意識覺醒的視覺符號。○符號的所指，除了象徵台灣總督府想要維持臺灣殖民政權的穩定與獨佔利益外，重要的是，不能讓「臺灣」這位患者，經由「福建省臺灣道」的符號刺激，重新連繫中斷27年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但是，對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產生更具破壞力量的視覺效果，是蔣渭水基於個人的政治情感皈依，放置了「中華民國」這個符號。「中華民國」，是因應當時自由民主的革命風潮，從封建帝制掙脫出來的產物，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讓漢民族人口居多的台灣，對未來產生幻想或期望。因此，除了台灣總督府主張的同化主義、台灣文化協會推動的議會自治外，還提供台灣人民一個看似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之選項。某種程度來說，對擁戴君主立憲的日本帝國及其國家主義，無疑撼動了《日本帝國憲法》〈第一章天皇〉「第一條大日本帝國是萬世一系天皇之統治」的根本基礎，²⁴暗示台灣脫離日本國體的煽惑。

（三）協商（negotiation）

殖民話語的擬仿，具有一種協商的機制。在這種協商過程裡，產生既妥協又對抗的力道，透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有的重疊部份，進行抵抗策略的偽

22 從宏觀的世界歷史來看，西元1830-1914年這階段，其國際局勢變動快速詭譎，正處於各種新舊的意識型態活動風起雲湧的爭鬥階段。例如，十九世紀在歐洲因近代國家主義的影響，導致舊帝國的崩解，如土耳其等。以種族、語言、文化等共同特質的國家意識興起，卻促成新帝國主義的擴張。如雙面刃般效果，許多列強殖民地意識覺醒，並掀起民族運動，如英國領地下的印度。Edward McNall Burns eds., "Chapter 24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Western Civilizations*, Tenth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4), pp. 807-813。

23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這麼形容，此波民族意識的風潮對台灣的衝擊：「到了大正七、八年左右，也就是歐洲大戰的末期起，歐洲思想界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思想興起，隨之而來，所謂民族複合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民族自決主義也見抬頭，在戰後的和平會議，這種主張也被採用到講和條約中去，而這種風潮對遠東的臺灣人、朝鮮人和其他各殖民地民族都有很大的影響，成為促其民族覺醒的動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第一章文化運動〉「第三節東京留學生の諸運動」，《臺灣社會運動史》，頁23；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11），頁41。

24 伊藤博文，《帝國憲法皇室典範義解》，頁2-4。

裝。²⁵ 當時大正10年詭譎的政治氛圍，既有自由民主的洶湧思潮，也有「萬世一系」的國家主義相抗衡。²⁶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是位漢學思想濃厚的政治人物。²⁷ 換句話說，面對文化協會活動的取締與文化協會會報的審查等問題上，田健治郎總督掌握著主導的權力時，蔣渭水必須配合田健治郎維持社會秩序與政治穩定的價值取向，²⁸ 以便他嘗試實踐《日本帝國憲法》〈第二章臣民權利與義務〉「第二十九條」關於日本臣民在法律的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的自由」賦予台灣「帝國臣民」的權利。

在〈臨床講義〉文本裡，「姓名：臺灣島」看似表面不具政治意涵的地理位置稱謂，其被命名是蔣渭水當下現時性的作為。那麼「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則交待了「臺灣島」這位患者無可抹除的民族文化成份，在思想、道德、行為規範的傳統價值上，連繫了遙遠過去時空裡的中國。「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人名符號，是蔣渭水追溯患者歷史身份的文本脈絡。這些符號的外在能指，具備彰顯儒家核心思想的表徵；內在所指，則隱喻著漢民族意識難以抹滅的延續性。因此，「素質：為上述聖賢後裔，素質強健，天資聰穎」，直白地強調，這位患者內在流動著漢民族優秀的文化基因。對於台灣總督府向來認為，先進發達的大和民族理當同化漢民

25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5。

26 鹿野政直對這衝突對立的現象，源於民主思潮對「國民」符號的解構：「有日本國籍的人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稱呼是「臣民」，意味著大家都是在天皇制底下。但是實際上，為了加強大家的一體感，面向世界時，多使用「國民」。……在這個過程中，以一九一〇年代為中心，是高倡「民主」的時期。那些主張確立以非特權階層及一般民眾為政治、文化主體的人，將他們的立論根據諸於「國民」。」鹿野政直，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05），頁165。

27 田健治郎是明治維新過渡大正民主思潮的保守人物，有著漢學思想薰陶的教育背景。他是首位文官台灣總督，出自平民內閣的原敬首相任命。政黨屬性，為國家主義保守傾向的政友會。出身貴族議院的背景，與尊崇皇室的長州藩閩元老山縣有朋，交往密切，深受其指導。其任內（大正8年至大正12年），主導皇室及東宮太子蒞臨台灣一事。他的言行與思想，散見田健治郎在大正八年至十二年的日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中、下冊。以大正10年4月2日的日記顯示，田健治郎對林獻堂與其子林攀龍，諭示台灣議會設置與日本帝國憲法精神，有所違背衝突，強調東西洋文化思想的差異與漢學修養的重要性。他並且指責台灣議會設置活動，將使台灣社會思想激盪，暗示會動搖社會的穩定秩序。《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116。

28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附件〈田總督上衙履新〉：「今也，世界兵禍漸戢，得見平和曙光。奈思潮動搖殊甚，歐美列國無不艱難多事，大勢所及，不免多少影響。如徒競新術奇，破壞善良之社會組織，或陷於膠柱守株，固陋滯滯之弊，共深戒慎避之。勉侷〔俟〕時勢之進運，取捨得宜，以保持社會之安寧秩序者，目下之一大要件也。」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63。

族的基本邏輯而言，²⁹ 這句話卻預設了，蔣渭水對當時台灣總督府所謂的「同化」，予以逆轉的論述空間。³⁰ 昭和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對這項漢民族意識濃厚的優秀文化論，解讀為蔣渭水更深沉的政治謀略，有等待漢民族型態國家解放的企圖。³¹ 這項解讀，倒是很符合蔣渭水自學生時期以來，就支持中國革命行動與接受孫文學說指導的政治傾向與期待。³² 同時，解釋了在「原籍」條例裡，置放「中華民國」符號的理由和意圖。

另外，在〈臨床講義〉內文裡，蔣渭水以「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指出台灣社會現階段要擔負的工作與責任。這種強調台灣在國際重要性的語句，可視為組織成立時進行的一種心理宣傳策略。這看似淺顯的意旨，讓文化協會的同志們對組織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產生巨大的使命感與榮耀。然而「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這句話的政治性意涵，必須參照早於〈臨床講義〉撰寫的〈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這篇為大正10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的致辭講稿，對這句「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有更完整的闡述脈絡：

-
- 29 這種基本邏輯，在大正9年10月1日〈附件四：田總督之諭告〉，即可看到：「然更潛思對照於我明治維新以後國運之發展。文明之開進。覺其間尚有逕庭。是畢竟由於台灣孤懸海外。久與世界之文明隔絕。而且我統治之日尚淺耳。固不足怪。」請見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468。
- 30 蔣渭水認為同化的基本想法，應該是文化優秀的民族自然地同化相較劣等的民族，影射台灣社會裡日本內地人與本島人的現況：「文化的質優秀，就會同化劣文化的民族。民族的數多，就會同化少數民族。同化是全不在治者與被治者的地位關係啦。」蔣渭水，〈治警事件法庭辯論〉，《臺灣民報》2卷16號。
- 3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云：「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嚮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時常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勵民族的自負心」，譯文引自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06），頁14。此書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之中譯本。
- 32 根據學者研究指出，明治43年（1911）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醫學校在校學生，參加中國同盟會在台灣的外圍組織「復元會」，與中國推翻滿清的革命行動發生連繫。請見林瑞明，「民族意識與復元會」，〈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成大歷史學報》12號（1985.12），頁290-295；黃敦涵編著，《翁俊明烈士編年傳記》（台北：正中書局，1977），頁24-25。在杜聰明《回憶錄》：「民國初年前後，筆者是在醫學校之學生時代，我們臺灣青年雖受日本統治下，但我們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歡喜革命成功。我們醫學校學生及國語學校學生有志相連繫，秘密集會。……討論時局的變化，及募款寄附往國內作革命資金之一部份，醫學校學生中最熱心者蔣渭水、翁俊明、蘇樵山、曾慶福及筆者。」指出蔣渭水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學時，對政治社會運動的關注，就表現相當活躍。其意識型態裡，早已充斥著漢民族意識。杜聰明，《回憶錄·上冊》（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06），頁63-64。

這裡，在報告文化協會創立經過之前，我想要說一些關於本會創設的動機。說來話長，因為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〇〇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所以台灣人生來就帶著連繫與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了！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前提，也是其骨格。想要謀求東洋文化的啟發，就必須依賴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力量。也就是說，亞細亞民族結盟起來，互相啟發東洋文化，以追求與西洋文明並駕齊驅，才能融合東西文化趨向一致，並使東西方平等相處。

東西文化一致，就是世界大同之前提。因此亞細亞民族同盟必然是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大同、和平是人類最大的幸福，也是為數十七億餘的全人類的最大願望。由此可見：我們帶著的使命就是媒介日華親善，促成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契機，以達成人類最大幸福的世界大同！

將以上事情歸納後換句話說，也就是想要祈求世界和平，必先締結亞細亞民族同盟；想要締結亞細亞民族同盟，必須謀求日華親善。想要謀求日華親善，必須驅使是〇〇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置身日華之間首當其衝的台灣人，這也是順理成章的理論吧。這樣看來，也不得不說：台灣人手裡握有世界和平的第一道關口的鑰匙，這實在是一個意義深遠且責任重大的使命啊！³³

從〈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一大段話裡，可以看到〈臨床講義〉「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這句話的論述邏輯性：「全人類的最大幸福」→「世界大同、和平」→「東西文化一致」→「亞細亞民族同盟」→「日華親善使命」→「世界和平的第一道關口的鑰匙」→「台灣人」。這裡所謂讓世界和平與全人類獲得幸福的「台灣人」，就是內文所云「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〇〇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前述已經說明，「〇〇」所遮蓋的原本符號，既是台灣總督府戒慎恐懼之所在。同時，也是蔣渭水論述裡的用心真

33 引自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6-697。

意——台灣人是中華民族。「中華」這符號，卻是漢民族意識與民族自決的表徵。所以，遭受「○○」的權力干涉。

在政治現實下，蔣渭水的用心真意，必須利用這一大段的論述來掩護。但是，這段的論述，如何具有掩護的作用？在於這論述模仿並唱和某些日本殖民者的論調，類似板垣退助來台推動「同化會」那一類的日華親善言論。³⁴ 這種言論，實為當時日本內地政壇裡，有別於主張佔領支那做為日本國防線擴展的意見，³⁵ 也是基於「脫歐興亞」論與南進策略的考量，³⁶ 倡導日本與中國形成亞洲「黃種人」結盟，以對抗西方列強「白種人」的優越感與種族競爭。

由於蔣渭水在大正14年撰寫〈五個年中的我〉明白表示，反對板垣退助的同化會主張與台灣總督府推行的同化主義。³⁷ 因此，在大正10年的〈臨床講義〉「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語言，隱含著日華親善的延伸性意味，對台灣總督府的監視審查機制，展示台灣文化協會不妨害殖民當局的統治理念，願意配合日本在亞州的戰略與佈局。因此，這句話更具有當時寫作運用技巧上的權謀，是協商過程裡既妥協又對抗的政治成份，所呈現的一種抵抗策略。這可印證〈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前引文的論述後，緊接著蔣渭水就說明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置動機「現在我們決定要打造有能力實踐這個使命的

34 請見板垣退助，〈關於臺灣同化會的首倡〉：「我帝國今後的問題。可謂悉繫於外交關係如何，尤其是中日兩國的親疎；對於我國運的消長至重大，自不待論。方今歐美人士，往往以人種感情出現國際，因此，亞洲人士遭受迫害的事實，到處層出不窮，前途實堪令人寒心。……希望帝國新領土的臺灣島，作為南門鎖鑰，並成為日華兩民族的接觸地。所以臺灣島的統治如何，實不但不啻對世界顯示我殖民政策之成敗，而且也將成為決定日華兩民族離合的端緒。……如是，台灣三百萬島人便能悅服王化，渾然成為一體，成為忠良的國民，那麼，進而作為日華兩民族交歡的階梯，鞏固東洋和平的基礎，以貢獻興亞之大計，豈可以謂之架空的希望？」。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6-27；對於台灣文化協會負有「日華親善的使命」，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編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解讀為隱藏孺慕中華民國的意識。請見〈第六章台灣文化協會〉，《臺灣民族運動史》，頁281。

35 這擴展國防線的想法，以長州藩閩山縣有朋的言論為代表，對當時大正時期日本政壇，有主導方向的影響，並且提供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合理化。請參閱李永熾，〈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275-277。

36 日俄戰爭後，因三國干涉遼東半島歸還問題，導致日本內地興起國粹主義、本土主義之「脫歐興亞」論，對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與井上馨的「歐化主義」的反動。進而刺激日本的國家主義膨脹，形成南進論述。此論述奠基於日本以亞州盟主自居的亞細亞結盟，實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

37 「至於同化會呢，這是大不通的行動……及至這次提倡台灣議會的請願，和我的主義上大都暗中相合。我感覺著這種辦法，才是台灣人唯一的要走的一條生路！」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號，大正14（1925）.08.26。

台灣人。這正是本機關誕生的緣起了！換言之，本協會即作為此種人物的養成機關。」，³⁸對於參與大正10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成立，在場聆聽蔣渭水致詞的日本來賓包括警政教育等官員，³⁹無疑製造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擁有推展文化運動的合理性。⁴⁰

所以，面對台灣總督府掌握著〈臨床講義〉及其承載體的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存在與否的絕對權力，〈臨床講義〉內文裡符號的佈置「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素質：為上述聖賢後裔，素質強健，天資聰穎」、「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可視為當時台灣總督權力干預思想言論的政治現實下，⁴¹一種各說各話，各取所需的協商。⁴²深究這幾句政治語言背後的策略與意圖，不啻為一種概念隱喻（concept metaphor）的刻意誤用（catachresis）。⁴³最終目的是，蔣渭水讓隱藏在〈臨

38 引自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7。

39 包括蔣渭水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前後任校長高木友枝、堀內次雄，田川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校長，北警察署長，萬華分署長等。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編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287。

40 〈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大正十年七月十八日，有關本會創設事項，我認為還是事先得到當局的諒解為妙，吳海水君及林麗明君與我三人，訪問川崎警務局長於其官邸，向局長說明本會的性質後，川崎局長承諾，若是文化運動就沒問題。八月十一日，我應川崎局長召見，對於當局的諒解範圍恐會發生誤會，局長再三釋明：當局對本會的諒解是對文化運動的諒解，而非對政治運動的諒解。」，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9。

41 〈大正九年（1920）十一月二十九日〉記述裡，田健治郎回答蔡培火有關臺灣自治的實行問題，表明他對臺灣議會設置的態度：「予所採統治之方針，在善導臺灣人民達於與內地同等之域，今回臺灣地方自治制之開始，其目的不外之。若臺灣全島自治之企，斷斷乎不許容之，若誤而有觸此禁者，可取嚴重禁遏之處置，切勿招誤解云云。」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548-549；然而，蔣渭水在〈五個年中的我〉卻表明著，台灣議會設置才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現實，使得蔣渭水要讓〈臨床講義〉獲得發聲的機會，就必須要虛與委蛇地應付。

42 田健治郎尊崇孔孟思想，強調忠君的道德秩序與教化民心的理念，與其學習背景有關。他強調孔孟思想與台灣社會秩序等，互有價值觀念的關聯性。例如，他在〈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六日〉回答眾議院安藤正純議員的談話：「若夫到現今臺灣有識階級，大部分其思想概在尊奉孔孟之教，以忠孝仁義為道德最高標準。對之，急激欲注入共產主義、公妻主義、階級打破主義，其攪亂民心、破壞秩序之虞頗大矣，予斷然不可不採其防遏手段也云云。」，即可見一斑。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459；然而，蔣渭水反對台灣總督府的獨裁專擅，甚至可能反對以尊崇皇室為核心的日本帝國體系。他主張以民族自決為精神指導，著眼於民主的精神，執行台灣議會設置的自治路線。因此，如正文所論述，蔣渭水使用「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符號，著眼於取其漢民族意識的表徵。對同一主題，蔣渭水與田健治郎，卻有著各自表述與納為己用的考量，這正是「各說各話，各取所需」詭譎的政治語言符號操作。

43 catachresis可稱為誤用或濫用。在後殖民理論裡，被殖民者可以將殖民者傳授的知識或自認為的觀念，使其徒具形式而失去原有的內涵。或是取用被殖民者自身的傳統文化概念，加以扭曲和挪用，達到反殖民的主張。「一個沒有充分指涉的概念隱喻是一個誤用。那些以誤用為基礎的聲稱，也製造了一項去結構化的後殖民性」Gayatri.C.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60

床講義〉文本裡的政治意圖，藉由展示符號的所指，得到絕佳宣傳的場域。

三、台灣의 診治

語言符號，在〈臨床講義〉整篇文章裡，無所不在地展現其聚合的軌跡。書寫，是語言符號依賴的生存方式，既可顯示作者想要傳達的訊息。同時，隱藏在符號及其訊息裡，作者的思考與意識，卻也因此暴露其行蹤。所以，在段落或條列的規劃空間內，這些符號刻意地聚集而築起文章的架構，這是一種能指的展示，並且還原其知識體系裡的所在位置。換句話說，〈臨床講義〉的語言符號，在「臨床診斷書」框架的約束下，轉化為描繪民族體態的政治性話語。蔣渭水透過身體符號及其隱喻，在審視歷史文本中診斷台灣自身的弊病，藉此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殖民政策的失當。最後，根據當時社會文化的病態現象，形構理想的民族體態，制訂出根本療法及其具體處方，為台灣執行體質的現代性改造，才能接軌世界文明的時間。最終目的，為喚起台灣社會對民族自決的認知與覺醒。

臨床診斷書的醫學本質與西方文明性，使得〈臨床講義〉迥異於傳統文人針砭時政的辯證方式。在臨床診斷書的體例裡，除了呼應蔣渭水的醫師背景外，其完整的形式結構：首先，由「姓名」、「性」、「年齡」、「原籍」、「現住所」、「番地」、「職業」、「遺傳」、「素質」、「既往症」等符號，構成病患個人的完整病歷（chart）包括過去的家庭史（family history）、體質和遺傳的測定、過去病史（history）的追查脈絡；其次，透過「既往症」、「現症」、「主訴」符號的描述，除了記錄患者自訴的症狀（symptom）外，醫師的專業訓練與臨床經驗，藉由臨床病理的肉眼檢查（gross examination），呈現出患者身體外部器官功能的觀察、內部器官的透視、疾病的徵象（sign）；再由「診斷」、「原因」、「經過」、「豫後」等符號，確立病因（cause）、病理機轉（pathogenesis）後，就能演繹病程（course）變化，得到預後（prognosis）的正反預測結果；最後，「療法」符號具體展現的處方，是綜合以上的判斷，訂定一套恢復身體秩序之具體可行的辦法，這也正是醫師之價值與意義的所在。

（一）誰來診治台灣

正如大正10年10月17日，蔣渭水在文化協會成立時，致辭講稿所言：

試看，全島的生活狀況到底顯現出何種現象？道德殘缺、社會制裁低落、人人唯利是圖、迷信嚴重、風俗卑劣且甚為缺乏衛生觀念。而所謂有識階級者，多數意志薄弱，並無堅定的信念亦無高遠的理想，只管理首於物質生活而無餘念。⁴⁴

以蔣渭水接受過台灣總督府醫學校5年醫學教育的知識分子來看，大正10年當時台灣的狀況，無論是傳統習俗、道德輿論或衛生觀念等落後文化的象徵，都造成台灣跨入近代性社會的不利阻礙。更重要的是，失落了過去傳統文化的思維和價值之優越性，只著眼於當下的安逸穩定與物質享受，又不願意接受島外的新思潮新觀念，這種滯礙始終阻擋了自身意識的覺醒。

對於〈臨床講義〉，無論是學者所稱「民族醫師」實踐「社會醫療」的場域，⁴⁵還是「政治醫療化」的純熟言說塗抹「政治的醫學化彩妝」。⁴⁶確實是蔣渭水以醫師的權威，使用近代醫學的語言，進行政治話語的實踐場域。這是當時大正10年（1921）蔣渭水的政治論述，意圖為國際思潮奔流下卻暮氣沉沉的台灣社會，注入道德重整與文化改革的新氣象。問題是蔣渭水自身以何種符號形態，出現於〈臨床講義〉的文本裡？

檢視〈臨床講義〉的日文版本及中譯本，除了林柏維的《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黃煌雄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這兩本書裡的〈臨床講義〉中譯本，在文末有這段「主治醫師 蔣渭水」的署名外，⁴⁷其他版本則無。這「主治醫師」、「蔣渭水」幾個符號，其增添的目的，似讓〈臨床講義〉本身的臨床診斷書格式，更符合醫事文書的完整體例，或者出自為〈臨床講義〉正

44 引自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7。

45 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14。

46 葉永文，《台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6.09），頁76。

47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99；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頁205。

名的動機。但是，就符號的書寫而言，無疑是翻譯者的權力介入文本的表徵。

目前所能看到最早的日文版本，為蔣氏遺集刊行會在昭和7年（1932）3月刊行的《蔣渭水全集》。即使整篇〈臨床講義〉內文，並未出現「主治醫師」或「醫師」、「蔣渭水」等符號。但是，內文第二段的副標題「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即「關於名為台灣這位患者的說法」，就揭露了蔣渭水以「作者」的身份，賦予自身論述臺灣為何生病的權力。然而，另一種「醫生」身份，又如何進入〈臨床講義〉的文本？

蔣渭水在〈私の主張〉（即〈我的主張〉）解釋了他的「醫生」身份如何介入台灣社會，擁有「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的論述正當性：

因為我是醫生，所以能知悉台灣人的實情，他們如何苦惱，如何詛咒現在的政治，無論如何想辦法使台灣人的生活稍安定一點，有非除去對於政治上的不滿不可的願望。⁴⁸

正因為「蔣渭水」這符號，也是隱含在「臺灣島」病患的行列內。憑藉瞭解社會自身弊害的病患與醫生的雙重身份，蔣渭水透過〈臨床講義〉內文「衛生全く缺乏し」的「衛生」符號，建構近代醫學與政治之間的互文性。誠如大正12年（1923）蔣渭水發表〈廣義的衛生論〉一文，就將「醫治」與「政治」這兩件事，在「治」的符號聯結下，操作字義與符號的重疊效果，對於醫治人病的醫師兼具診治社會弊病的社會改革者，給予合理詮釋的通道。指涉「醫師」這個符號，透過「衛生」符號的仲介，得到了政治改革的符碼（code）：

自古靠醫術治療疾病謂之醫治，執行醫治的人謂之醫者。同理，依法律治療社會之病謂之政治，執行政治的人謂之為政者，即官吏或治者。而接受醫治的人謂之患者，接受政治的人謂之被治者。醫者與患者，治

48 蔣渭水直白地說明，他由專業醫師的角度可以診察到當時政治帶來社會人民的苦惱。蔣渭水，〈私の主張〉，昭和2年2月27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417。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冊》，頁129。

者與被治者的關係是相同的、是相對的。此所以醫治與政治同樣帶有「治」，故醫治與政治皆衛生之道也。⁴⁹

可以這麼說，「主治醫師」、「蔣渭水」這些符號，確實隱藏在〈臨床講義〉的文本裡，以創作者、醫生與社會改革者的多重意識形態，行使既有的權力，介入〈臨床講義〉裡的符號書寫。這是決定〈臨床講義〉其醫學形式的文學語言，轉變為政治話語的重要關鍵。同時，就此展開文學、醫學、政治三者之間的互文性。

「主治醫師」，說明蔣渭水在發表〈臨床講義〉之前，經過台灣總督府醫學學校五年專業技能與基礎學識的訓練，以及宜蘭醫院一年的實習與台北大安醫院的五年開業經歷。⁵⁰換言之，這代表「蔣渭水」接觸了台灣的近代醫學及其教育體系所帶來的新式觀念與學說，而台灣近代新式醫學在先天本質上，即具備西方文明的近代性表徵，⁵¹如生理學、病理學、解剖學、衛生行政等。但是，在台灣總督府移植的過程裡，被賦予殖民服務及馴化的工具性。⁵²就殖民

49 蔣渭水，〈廣義的衛生論〉，發表於1923年2月的《台灣》雜誌第四年2號（原為蔣渭水，〈廣義的衛生講話〉，《臺灣》日文部之第四年2號，大正12年2月1日），頁47。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88。

50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號。

51 依照籌設台灣總督府醫學學校的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之談話「本島之所謂「醫生」者，到底算不算醫者？可不可託以寶貴的人命？實不必明述，大家都很清楚。事實上，他們連生理、病理為何物都不知；最甚者，更有不識字者，他們只聽患者的陳訴，使隨便捉一些草根樹皮塞給患者。」引自莊永明，《台灣醫療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8.06），頁172。這說明台灣近代醫學對「醫師」符號的塑造，是限制在生理學、病理學及其實驗等等學科之西方近代科學的實證性知識體系內，被賦予文明知識者的所指（signified）。

52 明治36年（1903）11月8日，後藤新平於台北醫院的第一回醫師會大會的演說致詞裡。他為了維護日本內地國民抵抗台灣殖民地的特有風土病，提出自認最佳的經營手段，首要為「醫學」：「如諸君所知，敝人到本島赴任之際，即考慮將新領土的經營置於生物學的基礎上。蓋此方針幾乎為世界所公認……既然要將基礎置於生物學上，有關本島經營，最適當的不外是是醫學。應肩負本島經營重任的，是立志遠赴他鄉的母國人。……而研究克服風土影響、獲得抵抗力的方法，捨醫學之外，則不可得。」引自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閣下演說（台灣醫學會第一回大會）〉，頁1-2。《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民政長官時代，「演說及訓旨」（來源：<http://tbmcd.db.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檢閱日期：2012.05.06）。譯文引自范燕秋，〈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10），頁20。這恐怕是明治4年至明治7年（1871-1874）牡丹社事件，台灣風土疾病造成日軍重大傷亡的歷史記憶。為了在台灣的日本內地殖民者之長遠利益，勢必要培養台灣本地的醫師，才能解決殖民地新式醫療與衛生防疫的人力不足問題。除此之外，據第五任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小田俊郎的說法，認為後藤新平引進新式醫學仿倣西方基督教的醫療傳道方式，產生收攏新附民的類似宗教性作用，達到政治馴化的目的。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台灣醫學五十年》（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11），頁48-49。

政策的規劃而言，對於「主治醫師」的「醫師」符號，除預設了殖民服務與維護台地民眾生命健康的基本所指外，尚且因其嫻熟國語（日語），而被賦予移植日本內地文化，以及擔任官民之間溝通橋樑的能指形式。⁵³

事實上，近代新式醫學裡的「醫師」符號，正是日本明治維新為了擺脫列強的侵略，轉向西方近代文明學習的產物。由日本再移植台灣的過程裡，促使在台灣的內地殖民者，不得不因「醫師」符號具有先進文明與知識的表徵，給予在台灣社會階層裡，享有權力的特別優待。⁵⁴ 這種充滿知識與權力糾葛的矛盾心態，⁵⁵ 說明「醫師」符號雖具備殖民衛生服務的預設，卻因接觸了近代相關人文科學思潮，又有萌發自身意識覺醒的可能性，進而結合了「醫師」符號被賦予社會階層崇高的地位，隱含著領導人民集體反抗的變數。顯然，對於高唱「內台一體」的同化主義下，台灣總督府推動台灣跨入近代化，這是必須經歷一場頗具風險的考驗。

從明治31年到大正10年，「醫師」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已經有了多重變化：「醫師」符號，因其嫻熟國語（日語）殖民教育的語言符號，提供殖民馴化的工具性，使得蔣渭水及其〈臨床講義〉，看似失去語文的主體性，有淪為殖民書寫的危險。⁵⁶ 但是，語言本身的工具性，反而成為獲得體制外新知訊息

53 明治31年（1898）2月，山口秀高發表〈台北醫院內二於ケル土人醫士養成ノ景況〉裡，提出統治台灣的百年長計大策。他認為將日本文化永久移植到台灣，除了維護本島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增進公眾衛生而使其明瞭民政的德澤外，還可以讓本島精英教育裡的醫師轉變為日本文化的輸入者，當作官民上下之間的溝通管道，促成台灣社會大眾可以明白日本當局的意志。請參閱山口秀高，〈台北醫院內二於ケル土人醫士養成ノ景況〉（明治31年2月），頁9。《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民政長官時代，「台北醫院內二於ケル土人醫士養成ノ景況」（來源：<http://tbmcd.b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檢閱日期：2012.05.06）。

54 蔡培火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拼命向歐美學習，就中最致力的就是學習歐美的醫藥衛生與法律制度。因為要普及西洋醫療方法，所以對醫師特別優遇，醫生的社會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提高。人多少總是受習慣支配的，日本人當然也不例外；所以同是台人，但日本人對於醫生却是另眼相待。」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編著，〈第一章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3。

55 在明治32年（1899）總督府醫學校開校典禮，山口秀高的另一段談話，即如此印證著：「有人說：『對於台灣人不需要教授醫學這種高尚的學問……日本人教育土人，啟發土人，讓他們變得聰明是多餘的事，而且是一項錯誤政策，實為有害的事。』我們認為要馴服新的人民，啟發其知識，原本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值得介意，也不值得辯駁。這種言論，很有可能是來自英國人統治印度，對印度人政策的錯誤看法。這些想法是假設教育台灣人，使他們更聰明，則可會像菲律賓、緬甸的反抗精神一樣，人民必會產生獨立思想，群起反抗政府。」引自莊永明，《台灣醫療史》，頁271。

56 王德威，〈大病文人醫——兩位大夫的故事〉，中國時報「時報科學與人文」專文（來源：<http://forums.chinatimes.com/tech/techforum/040411a1.htm>，2004.04.12）。

的途徑，可以借鏡世界其他被殖民者的類似處境及其解決方法，⁵⁷ 開始建構自身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指導理論與運動。原本「醫師」符號兼具官民之間的仲介者，執行殖民政府的訓令，如檢疫政策、宣傳衛生清潔新觀念，卻也因賦予特權的所指，異化了本身被預設的殖民性，成為改革民智、推動反殖民社會運動的領導者。

這「醫師」符號的意涵衍繹，指出了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初期，中堅會員與主要幹部的組成，與醫學生、醫師等背景，有著相關的聯繫性。但是，這時期讓「醫師」符號，從殖民性預設的框架裡，獲得逃逸而產生激烈的異化是「蔣渭水」這個符號。大正時期同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的本地醫師，應該有著自我覺醒的相似經驗。⁵⁸ 又加上蔣渭水個人性格與生命經驗的特質，⁵⁹ 及其

57 例如台北警察署特高警的祕密檔案，對於大正10年（西元1921）初的蔣渭水思想活動，還是有具體調查的陳述：「約在大正十年初，（蔣渭水）沉迷研讀改造、解放、前衛、啟蒙他人等思想雜誌。又愛讀主義方面的單行本，如印度甘地、愛爾蘭E.de Valera、黑人が——べ——等事蹟研究……。」請見〈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警高秘第16077 台北州知事通報〉，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圖書館的內田嘉吉文庫所藏總督府檔案影印本，引自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頁62；E.de Valera，正是在1918年領導新芬黨（Sinn Fein）進入英帝國國會的領袖。

58 蔣渭水一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賴和在〈高木友枝先生〉裡，描述後藤新平當時的訓話，以及醫學校學生陸續的反映情況。可以推論，包括蔣渭水在內等聽訓學生們，應該感受到民族待遇地位的差別，應有自我與意識的覺醒。賴和回憶云：「後藤男爵在做民政長官的時代，是和醫學校有特別關係的，他自己原是醫生，且和高木校長也特別有交情的樣子，所以他辭官後，再來台灣時，便為我們醫學校生特別做一次的訓話，大意是講：『本島人諸君，要自己省察，我們只有二十餘年，對於帝國盡忠誠的歷史，內地人已有二千餘年歷史，所以不應奢望，若權利待遇，有些不似內地人，不宜就說不平。』向來我們大家都以為是浴在一視同仁的皇恩之下，不感到有何等的差別，經過後藤的一番訓誡，纔會自省，就中也就多少生出議論，高木先生也似有感覺，便有機會，便集全校生於一堂，為後藤男爵辯明，說，他是特別愛顧著我們，纔肯那樣說，要我們不要誤會。本來對先生的訓話，大家都是肅靜恭聽的，獨獨這次有的踢地板，有的故意高聲咳嗽，以亂其說話，有點使我疑惑。」後藤新平於明治39年（1906）辭官，所以他返校演講應為明治39年（1906）以後至賴和畢業前大正3年（1914）之間，即蔣渭水在醫學校期間。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287-288。

59 例如，蔣渭水追憶其醫學校學生時代：「我在醫學校的時代，曾要退學去內地，留學早大的政治科——我想是政治家比醫家對人類的活動範圍較大——後來因為有種種不得已之事情，竟做了醫生。但是這個願望，到今還抱著不變」。換句話說，蔣渭水對政治愛好更勝於醫學興趣，這種個人的特質，早已經悄悄將「醫師」符號異化了，並給予這個符號一個改變社會意識層面的「政治」能指形式。請見蔣渭水，〈獄中隨筆（三）〉，《臺灣民報》61號，大正14（1925）.07.19，頁12；以及就蔣渭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成績單〉的備註來看，在明治43年（1911）醫學校預科剛開始就讀時，曾因日本泥水匠辱罵台民而毆打日人，被學校予以留校察看的處分一事。刺激蔣渭水其民族意識的萌發，應該是日台民族待遇地位的差異所致，可以看到「醫師」符號異化的端倪。請見蔣渭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成績單〉及其備註的照片檔，請見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頁33；蔣渭水學生時期正涵蓋新中國推翻滿清舊勢力的前後期間，國民革命的相關新聞報導與消息，聯繫他同為漢民族的血統與文化，產生共鳴的作用。進而，使得民族意識在蔣渭水的意識型態裡，獲得覺醒的契機。請參閱註32，杜聰明，《回憶錄·上冊》，頁63-64。

近身觀察台灣社會民眾底層生活的實際體驗，⁶⁰促使「蔣渭水」符號開始脫離「醫師」符號的殖民性預設。

換言之，「醫師」、「蔣渭水」等符號，受到國際民族運動理論其新思維的指導和影響，並且結合台灣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的實際體驗，灌注了群眾運動的動能，發出政治與醫學的協商訊號。因此，擴充「醫師」符號的「關於臺灣本島二百五十萬蒼生增進其幸福」⁶¹基本所指，額外賦予個人化的政治性意涵。⁶²所以，「醫師」、「蔣渭水」等符號，不管有沒有以實質性的形象出現於〈臨床講義〉的內文裡，早就透過作者蔣渭水的多重意識及其書寫權力，介入〈臨床講義〉的文本，隱含在副標題「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的揭示中。

（二）病態的身體

〈臨床講義〉副標題「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即「關於名為台灣這位患者的說法」，除了揭露作者蔣渭水的多重意識與身份，對「臺灣島」行使論述的權力外，他以臨床診察的形式，通過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的操作，將「臺灣島」不同階層的集體性病態現象，⁶³統合在「患者」的符號裡。換言之，這個「患者」符號，藉由清朝到日本帝國時期的症狀描述，既顯示病史的歷時性記錄，又證明符號自身存在的說法。同時，「既往症」條例的症狀「身體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節操低下」，超越了時限性

60 蔣渭水開業的大安醫院，除了是接受近代醫學教育後，展現其專業知識技能的場所外，同時也是蘊釀其政治社會運動思想的場域。據白成枝在〈先烈蔣渭水傳略〉的回憶：「民國五年乃創立大安醫院，以仁術濟世，活人無算，其對貧苦同胞恆免費施療，深得社會人心，他日之社會運動基礎，已於此時奠定矣。」白成枝，〈先烈蔣渭水傳略〉，《蔣渭水遺集》（台北：文化出版社，1950），頁1。

61 後藤新平在明治33年（1900）3月18日的揚文會上，闡述設制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目的，以及勸誘臺民來就讀，並說明醫師工作的使命。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演說筆記（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揚文會）〉，頁7。《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民政長官時代，「演說及び訓旨」（來源：<http://tbmcd.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檢閱日期：2012.05.06）。

62 張深切這樣評價蔣渭水：「但他認為與其治少數人的病，不如治臺全體的病；與其治他人能治的病，不如治人不肯治而又難治之症。」。張深切，〈蔣渭水〉，《張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台北：文經社，1998），頁461。

63 對這種表現於階層的集體性病態，蔣渭水在大正10年的〈台灣文化協會趣意書〉對勞動人民、社會顯達、知識青年等，有較清楚的敘述和區別：「人心澆薄，人人唯利是爭。無智蒙昧的細民固無論，身占上流者，亦概專事揣摩迎合，以博取一身榮達為能事而終，而另一方面，青年則又多安於眼前的小成，薄志弱行，更沒有大志……」，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51。

(temporality)，與「現症」條例的「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破廉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志消沉」等症狀，串聯語義描述的重疊性和連續性，遂逐筆勾勒成當時台灣社會的病態肖像。

以「既往症」條例的「身體衰弱」與「現症」條例的「四肢倦怠」來說明，這裡所謂的「身體」與「四肢」，並不是肢體器官的虛擬，實為符號本身的原有所指。所以，「身體衰弱」、「四肢倦怠」強調的是，清朝至日治大正10年間民族體態一種歷時性生理體質的缺陷，意指台灣社會的傳統觀念上長期「重文輕武」的文化偏見，卻造成人民普遍在生理器官體質上的萎靡不發達。相對當時列強注重體育的競賽活動，以強化國民健康體魄的進步觀點，顯然這是當時追求文化向上的知識分子們，對國家種族間競爭生存下的共同憂慮。⁶⁴

從集體性的角度來看，當時台灣社會的病態肖像，藉由「現症」條例的那些症狀描繪來呈現。這勾勒組成的過程，似乎省略個人化的細部。但是，同年發表的〈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可以看到蔣渭水既是以醫生的立場診察這些症狀，又見到他含括在「患者」符號內的自我審視：

而所謂有識階級者，多數意志薄弱，並無堅定的信念亦無高遠的理想，只管理首於物質生活而無餘念。總之，我們墮落，並深陷於無底深淵之中，因而在我們的社會裡，充斥著墮落、腐敗怠慢、卑屈、寡廉鮮恥等難以收拾的缺點。⁶⁵

在這段引文的「我們」，既包括蔣渭水自己，也涵蓋台灣文化協會的同志們，甚至可以擴及解釋為當時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階層。這樣說明了，〈臨床講義〉「既往症」和「現症」條例的症狀，是基於道德文化價值的淪喪而批判當時的台灣社會，以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擔起責任的一種警訊。同時，某些程度

64 「身體之於精神也，其關係密矣。西彥云『健全之精神、宿於健全之身體』誠欲心之壯者、必期身之剛強、欲意之暢伸者、必期體之達用、欲身體之剛強而達用者、則必講武以修練之、體育之要、不可忽也。不幸吾人素厭勞働、重文而輕武……釀成吾人今日之體格、殆無與人並肩之地。……環球各文明國……蓋欲互相比較體育之強弱、以激增其國民之覺悟也。」請參閱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蔡培火等編，《臺灣青年》1卷1號（大正10年7月）。

65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7。

上，部分症狀亦可表徵為蔣渭水對自我意識的診視。以〈五個年中的我〉的自述，可見到片段的個人化細部，顯示蔣渭水含括在「患者」符號內的緣由：

開業了五年間，私情上普通的朋友——所謂酒肉朋友——卻是不少……。我的開業已過了十年間，前的五年間的我的生活，和後的五年間的我的生活，大有差別。換句話說，前五年的我，是做了無意義的生活……前五年間反比學窗時代全沒有熱熱鬧鬧活動的機會，這是我的怠慢呢？或是世上同胞的怠慢呢？起初我以為壞了！壞了！同志這樣難逢，則我一生白白地做物質上的生活過日——動物的本能生活——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精神上的生活、真正做人的生活將消滅去了。⁶⁶

然而，症狀並非疾病的本身，而是疾病藉此表現存在的媒介物或顯影劑。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已經指出症狀與疾病的因果邏輯關係：「可是這些缺陷乃某事之果，而非某事之因，將其經緯借醫學術語來說，這些缺陷意即非出現不可之症狀而非病因。」⁶⁷因此，在「既往症」、「現症」條例裡的那些症狀，不只是反映於精神人格與經濟物質層面的可視性外在，亦被蔣渭水視為清朝、日本帝國等階段的治理下，一種台灣社會集體病態的現象描寫：

我們台灣是有幾種很敗俗傷風、勞神費財的惡俗，是我諸同胞要從消極方面去破除的，如：燒金紙、吸阿片、祈安請醮、補運謝神，以及聘金婚葬之奢靡……等，這種種的陋風惡習，應該要迅速去破除節省。須知，祈安請醮、補運謝神、燒金紙之事，是古時野蠻人的習慣，是無意識的人的迷信，在這科學文明的世界，那種的事情，斷沒有存在的餘地了。⁶⁸

這裡，具體清楚批判這些脫離世界文明時間的風俗習慣，為台灣社會集體

66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號。

67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8。

68 蔣渭水，〈晨鐘暮鼓〉，《臺灣民報》3卷3號，大正14（1925）.01.21。

病症的文化表象，是「無意識的人的迷信」，不應該存在「科學文明的世界」裡一種「古時野蠻人的習慣」。這不僅指出台灣的部份病態，是缺乏自我意識的人們一種盲目無知的集體行為，更明白補述了〈臨床講義〉「風俗醜陋，過度迷信，頑迷不悟，全然缺乏衛生」等「現症」，是一種不具備科學文明，而且妨害國民健康的舊文化象徵。尤其，「衛生」這個符號的本身，對於台灣社會跨入近代化，是極具代表性。⁶⁹

從台灣近代醫學的發展觀點來看，「衛生」這個符號，藉由當時極具科學知識符碼的細菌學說，獲得近代性實質意義的所指。⁷⁰另一方面，它產生出新／舊的跨越界限，對「醫師」、「衛生」等符號，賦予趕上世界文明時間的能指與所指。這說明公共衛生、細菌學說等新觀念，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新式醫學教育與留學德國專攻細菌學的堀內次雄影響下，對於「衛生」的觀念與詮釋，可能滲透到蔣渭水的意識形態內。所以，從改革與進步文明的觀點上，對舊社會漢民族的文化習慣，蔣渭水提出了審視與批判。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衛生」這個符號，同樣具有檢疫、監視與管理的權力展示，並揭露一種殖民性的隱喻。⁷¹但是，如前述蔣渭水在〈廣義の衛生講

69 除了台灣近代醫學的奠基者——後藤新平將「衛生」視為管理國家這個有機體的有效手段外，森鷗外這位曾經來台的軍醫兼文學家，更將「衛生」符號含括在近代科學下，並且將它緊附於日本的近代化。請見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p.155。藉由學習近代衛生觀念，日本在近代化上，連絡了西方列強。進而，拋棄長久以來日本擁抱的古老「東方」特性。請見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p. 155。若從日本建構近代衛生思想體系的發展路線來看，近代文明的衛生思想，應該進入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細菌與衛生學等教育理論裡。因此，在〈臨床講義〉文本裡，象徵近代性的重要符號——「衛生」，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現症」的診察，就爭取到近代性的所指。

70 此細菌學說扭轉了希克波拉底以來風、水、空氣的重要性，以及近代「風土適應論」等，對「衛生」概念的傳統看法。使得台灣社會對「衛生」的看法，有關鍵性的轉變，包括檢疫政策與病因生成觀念、清潔習慣。劉士永對這轉變，有清楚的說明：「大致說來，日本殖民政府所推廣的健康觀與衛生論，在1910年代前後有過醫學理論上的轉變。這個改變是日本國內因應1890年代吸取德國細菌理論(bacteriology)後的結果；台灣在1910年代吸收該學說，並運用於已經在台行之有年的一些政策與制度裡。這種轉變，一則顯示了日本衛生官僚已能運用較為成熟的細菌理論於殖民地，同時也顯示台灣社會上對健康和衛生的看法，可能已從表面觀察的範圍，進入到一個必須仰賴儀器與化學藥劑才能判斷健康狀態及衛生水準的時代。」，〈「清潔」、「衛生」、「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頁287。

71 范燕秋認為日本推動台灣近代醫學，具有殖民醫學的特性，以維護在台的日人健康為優先考量下，如瘧疾防治等人種衛生措施。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詳述。請參閱范燕秋，〈第二章 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論〉，《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頁11-64。

話〉一文，將「衛生」符號換上了一層政治性的能指形式。自然地，蔣渭水有意強調「衛生」符號的另一層所指，即為國家和民族的改造。

回到症狀在病理學上的指示作用，就「現症」裡「衛生」符號的近代性能指與所指——「科學」、「文明」，即具有揭曉「原因」的功能。疾病，藉由症狀的表現，通知病人或觀察者的一種可被解讀的訊號。在訊號被解讀的過程，逐步指向病源或病因的所在。蔣渭水根據「既往症」和「現症」的診斷，在「原因」的條例中，得到當時「臺灣島」患有「智識的營養不良」慢性病的結論。就病理學的科學性描述，慢性病意謂身體在漫長的時間裡，逐漸喪失健康的體質，導致疾病的萌生與惡化。當然，疾病在〈臨床講義〉的文本裡，已經脫離病理學上的基本所指，被賦予社會文化層面的隱喻。因此，這「智識的營養不良」的慢性病，藉由「既往症」、「現症」條例裡的症狀，實則指涉「臺灣島」在歷史文本裡集體記憶與行為軌跡，被蔣渭水視為傳統社會文化價值的淪喪、與世界文明脫軌失序的表徵。

「智識的營養不良」的病源與「既往症」、「現症」的症狀，原本就有所指與能指的依賴關係。再根據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對症狀與病因兩者的互動邏輯，進一步說明：「本會無關其他事項，就是這種原因療法的專家。只管根治病因，那麼至今仍逞兇得勢的墮落、腐敗怠慢、卑屈、寡廉鮮恥等症狀，就會自然地消失地無影無蹤！」。⁷²「既往症」和「現症」的症狀，在〈臨床講義〉的文本裡，只是具有指示病源所在的作用。所以，蔣渭水才會抨擊日本帝國對台灣社會的病態矯治，只是一種處理症狀表象的「對症療法」，在〈臨床講義〉內文裡批評為「不完全的療法」。

這種「不完全的療法」，只針對症狀的表象治療，看似一時壓制或消滅了所謂社會症狀，卻無法深入發覺這個民族文化的病源所在。例如，台灣總督府對當時台灣社會普遍吸食鴉片的這種「風俗醜陋」現象，所採取的漸禁政策，

72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8。

即蔣渭水所云「不完全的療法」的最佳範例。⁷³對照之下，〈臨床講義〉裡蔣渭水制訂的「根治療法」即「原因療法」，必須依賴台灣文化協會的執行，方能澈底解決台灣社會的病態。從這裡可以看出，〈臨床講義〉的撰述邏輯，依舊導向台灣文化協會的正當性，以及反映〈臨床講義〉的宣傳意義與任務的所在。

（三）疾病的指示

當歐洲大戰結束後，世界的思想活動與意識形態的激盪，活化了許多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反觀，當時台灣社會仍然安於現狀而停滯不前，無法獲得世界文明的新知活力，容易遭到種族生存競爭的淘汰。這正是大正10年8月28日，〈台灣文化協會主旨書〉所述的情況：

蓋現今的文明乃物質萬能的文明。現在的思想則呈混沌、險惡的情勢。且近時的機運則為建設改造之秋矣。而我們台灣，位於帝國之南端，孤懸海外，因此，時常不能跟隨世界的進步。然而有如林子平所說的「日本的海水通達歐美」之言，台灣海峽實在不但為東西南北之船舶所往來的關口，而同時又是世界思潮遲早將匯合之處也。⁷⁴

雖然這篇〈台灣文化協會主旨書〉向日本台灣總督府當局的政軍教等重要人士說明，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動機，只是為了「謀求台灣文化之提高」，強調台灣文化協會是一種推行「切磋道德的真髓，圖謀教育之振興，進行體育的

73 台灣總督府針對台灣人民吸食鴉片的惡習，採行了後藤新平的漸禁政策，其目的在於，如學者楊碧川所言：「減少鴉片的吸食人口、防止新的吸食人口出現，最終達到完全禁絕鴉片。因此，即使是對特許購買鴉片的吸食者，亦特意添加繁瑣的手續和規費等各項限制，藉以迫使吸食者自動斷煙。」然而，此立意良善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扭曲為鴉片專賣利潤而護航，著眼於增進台灣總督府財政的收入，卻無法有效抑制吸食鴉片的人口數量。有鑒於此，對這項民族百年禍害的抗議，一直都成為蔣渭水社會運動的訴求之一。往後大正16年（1927）蔣渭水等人成立了「臺灣民眾黨」，其政策就直接主張「禁止阿片吸食，廢止阿片專賣」，批判日本當局這種「不完全的治療」的曖昧，凸顯台灣總督府在國民健康與財政利益政策上的矛盾現象。請參閱楊碧川，〈第二章 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傳》（台北：一橋出版社，1996.09），頁48-53；伊藤潔著，李明峻譯，《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8.07），頁99；蔣渭水，〈民眾黨綱領、政策〉，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冊》，頁218。

74 譯文引自林書揚、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頁189。

獎勵，更要培養藝術的興趣」之「新文化運動」。⁷⁵固然，這看似合理化的敘述，卻與其實際運作的政治活動，不盡符合。然而，這也是利用《日本帝國憲法》〈第二章臣民權利與義務〉「第二十九條關於日本臣民在法律的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的自由」的權利，以掩護其民族自決的深沉意圖。〈台灣文化協會主旨書〉與落款大正10年11月30日的〈臨床講義〉，同樣是圍繞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宣傳，兩篇的表述思維，也是接近互通的。因此，〈臨床講義〉內文「診斷：關於世界文化的低腦兒」、「原因：智識的營養不良」，正呼應〈台灣文化協會主旨書〉所云臺灣位於日本帝國的邊陲與世界思潮匯合處的矛盾衝突，顯示臺灣被隔絕於日本內地進步思潮之外，凸顯臺灣人與內地人同屬日本帝國臣民，實際上卻是國民待遇地位不一致的種族歧視。

所以，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就是〈臨床講義〉內文「療法：原因療法即為根治療法」的執行機關，因應解決「智識的營養不良」這疾病而產生。同時，也唱和〈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所云「文化運動就是原因療法」、「本會無關其他事項，就是這種原因療法的專家」。⁷⁶這種由臺灣知識分子獨自推行的文化運動，制訂自身民族文化弊病的根治療法，亦遙相履行了對臺灣自由民主思潮有重要影響且為大正民主運動（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的舵手——吉野作造，大正9年7月在《臺灣青年》創刊號發表的〈祝辭〉，對台灣文化運動的期盼：「蓋戰後世界各國，文化運動之潮流，正在澎湃流行之際。台灣諸君，亦不能晏如坐視以逆此潮流者」。⁷⁷

從生物性醫學觀點來看，「智識的營養不良」本身，並不是病理學上定義的疾病，而是蔣渭水透過醫師的身份或符號，賦予一種疾病的文學性隱喻。透過這隱喻，他想要警告二十世紀初台灣社會文化的本身演進，已經跟不上世界文明時間的變遷，可能會錯過獲得近代性與獨立性的契機。因此，「智識的營養不良」的病源，成為「臺灣島」患者在歷史時間裡，表現為外顯症狀的根本

75 同註74，林書揚、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頁189。

76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7。

77 吉野作造，〈祝辭〉，《臺灣青年》1卷1號（大正10年7月）。

所在。蔣渭水認為台灣社會因「智識的營養不良」所導致的病變，是想像的民族態身體因過去與現在政治因素的人謀不臧（即清朝的「政策毒害」與日本帝國的「不完全治療」），才使得「鄭成功時代」原初的健康體質，在歷史時間裡逐漸惡化而淪喪。

如果說〈臨床講義〉是具有召喚結構的文學文本，那麼〈臨床講義〉內文所揭諸「智識的營養不良」的病因，針對當時英法列強殖民政策的走向而台灣總督府卻採取逆向的同化主義，⁷⁸使得蔣渭水與台灣文化協會等幹部同志為「臺灣島」這位病患，勢必要打造一個符合世界文明時間的理想體態。

（四）理想的體態

症狀，除了依照本身的指示作用而做為病因的能指外，並且指涉了疾病與健康之間的絕對差異。因此，健康可做為病態的參照與對立面。從符號的觀點來看，這篇〈臨床講義〉的符號運動軌跡，就是以一種反映歷史現象的能指形式，隱約洩露政治意涵的內部所指。換句話說，當時台灣轉向非武裝抗日的氛圍下，〈臨床講義〉以醫學形式的文學語言，進行歷史文本的批判，給予文化啟蒙運動的正當性，以做為蔣渭水對台灣社會根本體質的改造。〈臨床講義〉文本裡的體質意謂著，擬人論的台灣身體省略了個性化的表現行為，著重於過去歷史的遺留痕跡與當前現存的集體化特徵。所以，蔣渭水必須在「既往症」、「現症」、「主訴」的身體敘事裡，為「臺灣島」描繪一個理想的健康體態，作為改善病態體質的範例。

在〈臨床講義〉發表前的時空背景裡，尋查這種改造思維的可能源由，對於當時台灣跨入近代性有著指導性影響的吉野作造，在《臺灣青年》對台灣

78 田健治郎揭示對台灣的殖民政策，既不是法國經濟資源獲得的殖民政策，也不是英國議會自治路線的殖民方向，而是日本帝國堅持同化的形式口號下，台灣總督府緊抓行政、司法、立法三權的獨裁專擅。請見其大正8年11月12日的日記裡，附件〈田總督上衙履新〉：「抑臺灣為構成帝國領土之一部，當然為從屬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非可與英法諸國屬領之惟本國政治的策源地，或只為經濟的利源地殖民地同一而視者。故統治之方針，皆由此大精神而出，為諸般之施設經營。使本島民眾，純然為帝國臣民，以忠誠於我朝廷。故宜教化善導，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62。

文化運動的批評中，可探見其端倪：「夫欲見文化運動真正之成功，必根源於古來之歷史與民族性」。⁷⁹因此，在〈臨床講義〉內文「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非常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實，品性高尚，動作快活」，即是蔣渭水為「臺灣島」建構一個原初健康的民族態歷史，指涉歷史文本裡「臺灣島」體質的純真性起源及其象徵。同時，這種建構「臺灣島」民族態歷史的意義與價值，可在大正7年（1918）完成的《臺灣通史》其自序，獲得具體的闡述：「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羣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⁸⁰因此，〈臨床講義〉建構台灣的民族態歷史，對於當時台灣知識分子而言，就展現出意識覺醒的召喚作用。接著，在民族態歷史的追溯裡，才能論述這個民族的文化體系之核心價值，進而推動民族認同的宣傳主張。⁸¹

換句話說，在當時高唱同化氛圍中而台灣主體性逐漸消解之際，蔣渭水賦予「臺灣島」一個正名的身體，包括優秀的外在體格與內在性格。其次，在民族體態起源的歷史基礎上，他模擬生理學體質遺傳的前衛觀點，開始建構「臺灣島」的民族屬性，追溯自「遺傳性顯著的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的文化連續性。因而，說明了「臺灣島」幼年體質的根基源於「如前記聖賢的後裔，故素質強健、天資聰明」。這種間接暗示漢民族意識的文字符號，緊扣〈臨床講義〉作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宣本意，揭露台灣文化協會培養「所謂節操、信義、勇氣、清廉、整潔等美德的人士」⁸²的目標，這正是台灣理想體態的組織成份。

從關聯性與滲透性來看，〈臨床講義〉應是影響台灣民族運動邁向實踐的

79 吉野作造，〈祝辭〉，《臺灣青年》1卷1號（大正10年7月）。

80 連雅堂，《臺灣通史》修訂校正版（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01），頁15；《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即為當時文化協會的理事之一，並於大正13年8月的第一次夏季講習會，負責講述「臺灣通史」。請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第一章文化運動〉「第五節 台灣文化協會」，《臺灣社會運動史》復刻版，頁150。

81 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應在民族主義形成前的大規模文化體系下被理解。因為文化體系正是孕育民族主義的所在，並作為民族主義的形成背景。Benedict Anderson, 'Cultural Roots',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p. 12。

82 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7。

表徵。⁸³某種程度地回應了，吉野作造所云獨立的文化民族，就是要有獨立人格者的鞭策。⁸⁴往後，這也為蔣渭水推行台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及其民族自決的政治意圖，提供一種基於歷史文化特性而構成的論述基礎。⁸⁵

但是，這種重新找回舊道德價值的民族認同，尚不足成為完全健康的理想體態，以應付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氛圍下，國家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充其量，不過是恢復原本民族身體的元氣。對於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台灣的身體要能跟上世界文明時間的推進，就必須再升級更新。因此，依據蔣渭水為「臺灣島」量身制訂的「根治療法」，連續二十年服用其處方：基礎教育的普及，包括「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以及公共知識和新訊息的傳播，包括「圖書館」、「讀報社」等「極量」的營養補充作為。這樣，才能夠獲得內外比例相符的頭部，即擁有理解「稍難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論」之腦髓，具備知曉「世界文化」的「精神的生活」與「宏大的思考力」。這樣一來，就不會因「過盛的物質欲望」，產生「過於勞動工作」的碩長手腳。這種蔣渭水為「臺灣島」診治與改造後的理想身體，既恢復自己光榮過去的歷史與傳統道德文化，又接受近代知識與教育的洗禮，才能具備新知與思考的特性，準備與世界的文明潮流接軌。

四、身體語言的表徵

(一) 思考的頭部

Giambattista Vico在《維柯的新科學》論述語言與人類身體的關聯性時，

83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云：「據大正九年（1920）末的調查，全台的支那留學生人數，只不過十九名，但大正十二年（1923）十月再調查，却已達二百七十三名之多……但最大的原因則為文化協會活動所帶來的民族覺醒的影響，這是堪可認定的。亦即，他們把支那視為民族的祖國而仰慕思念，對支那四千年的文化傳統，引以為榮，且對之懷有憧憬之念，並期待著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成功，以為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已為期不遠。」譯文引自林書揚、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頁232。

84 吉野作造，〈祝辭〉，《臺灣青年》1卷1號。

85 蔣渭水在讀報社一場名為〈群眾運動的原理〉的演講，其部分談話：「生物都具有特性，其特性以人類為最多，而且還有心靈的特性。漢族具有作為漢族的特性。……要發揮各人的個性及各民族的特性，這就形成文化的中心。國家必須以此做基礎，而後而治之。使用強制的模型，即以同化治人，是不可能的事，且是不可取的方策。如不是自治政策，則不能發揮各民族的特性。因此，必須把權利給與各民族。」譯文引自林書揚、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頁210。

談到：「人類的心靈自然地傾向藉由各種感官知覺，由身體外部看待心靈本身。只有透過極大的艱難，心靈才能憑藉深思的手段來理解它自己。這條公理給予我們在所有語言中語源學上的普遍原則：語詞，是從身體和身體的特性轉化而來，意指心靈與精神的制定。」⁸⁶ 在這樣的觀點下，〈臨床講義〉裡的語詞符號，透過蔣渭水的醫師身份而行使臨床診視的目光，掃描「臺灣島」這位患者身體外部的生理器官，甚至透視到身體內部的腦髓部位。從身體器官的形態改變（morphologic changes），經過象徵近代科學與文明性的診察後，演繹病理的機轉（pathogenesis）過程。最終目的，是獲得「臺灣島」這位患者的病因所在。

換言之，在〈臨床講義〉文本的場域裡身體符號的展現，原本依附在臨床意義（clinical significance）的形式架構下，回歸到臨床醫學知識體系的詮釋位置。然而，國家視為有機體的情況下，蔣渭水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的意圖，透過語言的隱喻，將身體符號轉換為精神心靈層面的民族改造活動。另一方面，卻能憑藉帝國憲法裡「日本國民」的掩護，將身體符號的生理印記，視為政治國體不當膨脹的嘲諷，隱喻著台灣議會的設置這個內政問題的優先性與正當性，隱約暗示了民族自決的意向。

這篇〈臨床講義〉藉由擬人論，將病患化約為台灣集體的表徵，透過身體符號的語言描述，把組織和器官分解於「遺傳」、「素質」、「既往症」、「現症」、「主訴」等條例裡。例如，「遺傳」、「素質」及其描述，可視為傳遞台灣的民族態身體特殊性，雖在肉眼診視裡藏匿了可見性，卻能透過集體記憶的潛在意識，被感知其所在。憑藉著「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非常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實，品性高尚，動作快活」的健康體態，讓「遺傳」、「素質」得到具體形象的顯影。對照之下，「既往症」條例的「進入清朝時代，因為政策中毒，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節操低下」以及「轉居日本帝國以來，不完全的對症療法」，導致「現症」條例的「四肢倦

86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 from the third edition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774」1970), p.78.

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全然沒有生氣」等病態，蔣渭水抨擊清朝與日本帝國異族統治的「政策中毒」、「不完全的對症療法」等人謀不臧，迫使鄭成功時代的健康體態消失，讓「遺傳」、「素質」由可視性轉為隱匿難察。然而，符號蘊含民族意識的所指，並不隨著政權管轄的轉移而亡佚，只是等待文學文本的召喚。

在「主訴」條例裡，首先病患自訴「頭痛、眩暈、腹內飢餓感」。蔣渭水利用臨床病理的診視，由「頭部」、「手と足」，乃至「腹部」的順序，進行身體外部的全身掃描。這診視的掃描，包含了台灣近代醫學知識體系的養成，如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臨床醫學的基礎技能和知識。其次，從「最初診察患者時，以頭部在身體的比例過大，應該有宏大的思考力」、「頭骨雖大，卻是內容空虛，因為腦髓不充實的緣故」等身體敘事，此為臨床診斷的描述。這種描述的當中，有著臨床病理上的分析與推測，以正反面體況的「宏大的思考力」、「內容空虛」，對「腦髓」的部位進行透視，獲得指向「智識的營養不良」病源的所在。

以上的臨床診斷描述，具有臨床醫學的科學性推測與文學文本裡寓言體裁的虛構性。同時，這種結合文學語言與生理構造、病理症狀的身體敘事中，也產生文學文本裡一種虛擬與想像的遊戲結構，⁸⁷指涉其政治性話語。這種遊戲結構的身體敘事，可視為蔣渭水有意描繪當時台灣的政治態身體（The Body Politic）：「但以二、三個常識問題試加詢問，其回答卻不得要領，由此看見患者的愚笨，可想像的到是位低腦兒」、「聽到稍難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論，便目暈頭痛」。「二、三個常識問題」隱喻的正是，一旦台灣完成基礎教育的普及後，台灣總督府對台灣文明化後的憂懼及其種族競爭的預

87 金惠敏，〈代序〉“an article used in lieu of a preface” 這篇訪談Wolfgang Iser一文，Wolfgang Iser認為：「支配虛構與想像相互作用的規律將形成一種『遊戲』結構，而這種遊戲結構具有一種互動性。首先，它能使虛構與想像之間的互動作用採取多種不同的形式，因為任何形式都不可能使虛構和想像及其作用一成不變，每一形式都承載著相關的歷史情景，這說明文本作為虛構與想像的活動空間總是對『歷史印迹』保持著開放狀態。」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陳定家、汪正龍等譯，《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02），頁7；借用Wolfgang Iser對遊戲結構的說法，蔣渭水對虛擬病患的台灣，以常識問題的虛擬詢問，可視為文學文本的一種遊戲結構。蔣渭水的意圖將此虛構化行為，指涉「愚笨」、「低腦兒」符號化的真實。

設。⁸⁸ 相對地，說明當時殖民教育的專門設計下，台灣社會除了醫學與國語教育外，實在欠缺與世界文明接軌的基礎知識建設，指出「精神的生活」貧瘠匱乏的源由。

然而，追溯「哲學、數學、科學」等符號的產生過程，這些符號一開始就已脫離漢字的文化象徵，即為日本明治維新後，啟蒙家和翻譯家所創制的譯詞、新詞。⁸⁹ 這些符號的本身，具備西方文明之知識體系的根本表徵。這些符號的產生，代表日本企圖趕上西方列強的決心，具有反殖民侵略的意味。蔣渭水在〈臨床講義〉挪用「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論」在殖民教育裡的近代性，著眼於反殖民性的啟蒙價值，讓「世界文化的低能兒」的「診斷」，以及「智識的營養不良」的「原因」，獲得合理性的詮釋。

從器官比例的身體敘事來看，頭部過大而內容空虛，是因物質欲望過旺和過度勞動而導致手足的碩長。這些器官部位的比例不當，表面似為象徵身體構成秩序的失調，實則隱喻著台灣社會階層結構性的突兀不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臨床講義〉的文學文本對「頭部」器官的隱喻，正代表著知識記憶與思考判斷的所在，賦予政治態身體一個指揮和權威中心，⁹⁰ 能夠領導尚未獨立思考的「手足」，避免淪為資本工業與國家機器的壓榨工具，召喚其自身意識的覺醒。⁹¹

88 明治31年（1898）5月兒玉源太郎總督在地方長官會議的訓詞所稱：「教育不可一日忽之，然必期不漫然注入文明流，養成競趨權利義務之論之風，而使新附之人民陷於不測之弊竇」，譯文引自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151；奠定台灣近代化基礎的後藤新平，在明治36年（1903）學事諮問會上，對於近代化教育可能開啟了台灣民智，進而損及台灣總督府殖民政權的穩定性，仍舊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未曾深思熟慮，徒以教育為善事而廣開學校，本身已造成殖民政策的錯誤。而終始原欲用以斬人的名刀，反成為自己切腹的利刃。」，譯文引自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台北：日創社，2006），頁19。

89 沈國威，〈第二章近代新詞與中日詞匯交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7。

90 John O'Neill, 'The Body Politic', *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Great Britain: SAGE, 2004), p.42

91 大正10年11月28日，與〈臨床講義〉同樣發表在《文化協會會報》1號的〈惱める魂〉（煩惱的靈魂）：「雖然勞動者拼命流汗勞動，但其利益總是餵肥資本家的肚子。而且勞動者本人却連當日的的生活也不能得到保障。同為人類，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事情啊！簡要地說，那是因為社會組織不對之故呀」，譯文引自林書揚、王乃信等翻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頁199。這同樣印證當時台灣政治態身體的失序不當，〈臨床講義〉裡的「手足」，在其身體部位與工具性的隱喻，正指涉當時台灣社會為資本家與工業機器的壓榨對象，追求三餐的物質溫飽，卻忽略精神生活營養的攝取。

如果「頭部」、「手足」兩者的比例恰當並且獲得協調性的話，這正是健康體態的寫照，以及身體秩序重獲平衡。然而，「頭部」的正常機轉實繫於「腦髓充實」，就必須仰賴「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論」等知識營養的獲得。這說明了蔣渭水醫師兼社會改革者的診斷合理，可表現出他開立「處方」成效及根治病因的信賴度。就政治話語來看，也呼應了蔣渭水在大正10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致辭：「現在我們決定要打造有能力實踐這個使命的台灣人。這正是本機關誕生的緣起了！換言之，本協會即作為此種人物的養成機關。」。暫且不論日華親善與守衛世界和平的夸夸之言，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發行及其各種講習會等活動，正是提供「腦髓充實」的智識營養來源，仍然回歸〈臨床講義〉其政治文宣的本意。

（二）女性的腹部

自大正3年（1914）大隈重信內閣因英日同盟的關係而決定參與歐洲大戰後，接著大正4年（1915）與中國北京袁世凱政府簽訂了「二十一條」要求，藉著德國在山東省膠州灣租借地等交涉問題，促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體膨脹，得以正式跨進西方列強瓜分中國本土的行列。大正7年（1918）歐戰結束後，日本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凡爾賽和談會議，與歐美等列強國並駕齊驅，終於達到明治維新以來「亞洲的日本」乃至「世界的日本」之國家主義的理想目標。⁹² 在〈臨床講義〉裡的「主訴」，蔣渭水以醫師的臨床目視權力，對歷史文本裡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組成的國體膨脹，以文學的諷刺性語言描繪為「腹部頓形肥大」的生理醜態，並說明其形成的原因「這大概是大正五年歐州大戰以來，因一時僥倖」，指涉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不當與投機取得列強的地位。

大正7年以來，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和平計畫〉，凡爾賽和談會議接受民族自決這一項原則，對於列強各個殖民地興起的民族運動，具有精神

92 陳水逢，〈第九章天皇制的變質與大正民主運動〉、〈第十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日本的影響〉，《日本近代政治史》（台北：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1995），頁155-170。

上的鼓舞作用，並且影響到朝鮮與台灣這兩個日本殖民地。⁹³ 以及大正10年以來，國際間鑒於歐戰慘劇而興起和平思想及相關的裁軍會議，對日本在亞洲與太平洋的帝國擴張，產生遏阻的力量。各種有關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思想的風潮，也在歐戰後的日本內地裡蓬勃興起，甚至有了平民化的原敬內閣出現。⁹⁴ 對於日本在國際外交自大又自卑的極端表現與內政上的詭譎動盪，使得〈臨床講義〉的文學遊戲結構對歷史文本「去夏吹起講和之風」得以再創造，以臨床病理的機轉「腸部即染感冒」、「嚴重的下痢摧殘」等內部透視，呈現身體器官的外部診察「原本極為擴張的腹壁急劇縮小」。這種看似臨床病理的描述，著實隱含了文學性或者說語言託寓性（*allegory*）的嘲弄意味。除了反映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外交上的挫折感外，其實，包藏著蔣渭水始終對「日本國民」和台灣議會請願設置這一貫的政治申論，以及面對政治現實中的協商過程。以下，就這一觀點來討論。

在這段「主訴」裡身體外部的描繪「腹部纖細凹陷，一如已產婦人，腹壁發皺，留有白線」，呈現出帝國女體化的視覺畫面。藉由產婦妊娠紋的轉喻，諷刺了近代日本知識分子自我肥大的想像而造成民族主義的扭曲，使得民族主義原以維護國家獨立性及集結國民的動能，甚至是國家與人民認同的民主精神，都在擴張自我防衛的藉口下，變質為帝國主義的養分。⁹⁵ 所以，「白線」這種妊娠紋，是產婦的腹部因膨脹而過度肥大，產後又迅即萎縮造成皮膚結締組織上的一種生理紋路，正隱喻著日本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並存的矛盾現象，即「對內要求國家與人民的認同，要求實施民主政治，對外卻主張帝國主義政策」。⁹⁶ 這樣一來，台灣與內地同屬日本帝國憲法下的「日本國民」，卻又

93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這麼形容，此波民族意識的風潮對台灣的衝擊：「前述的臺灣同化會事件結束後，台灣思想界暫時風平浪靜，到了大正七、八年左右，也就是歐洲大戰的末期起，歐洲思想界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思想興起，隨之而來，所謂民族複合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民族自決主義也見抬頭，在戰後的和平會議，這種主張也被採用到講和條約中去，而這種風潮對遠東的臺灣人、朝鮮人和其他各殖民地民族都有很大的影響，成為促其民族覺醒的動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第一章文化運動〉「第三節東京留學生の諸運動」，《臺灣社會運動史》，頁23；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41。

94 陳水逢，〈第十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日本的影響〉，《日本近代政治史》，頁170-174。

95 李永熾，〈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頁270。

96 同註95，頁271。

是帝國主義之南進論述的基地，⁹⁷ 包含民族性／國民性、法律性／殖民性等矛盾，說明「臺灣島」這位病患，為何在「性別：男」的身體，卻有女體化妊娠紋的變態，這正是蔣渭水藉此做為政治申論的緣由。

按照〈臨床講義〉前半段的文理而言，蔣渭水以「遺傳」、「素質」為民族性根底的台灣身體，直接釐清「日本國民」與「中華民族」的差異，就已經設法擺脫日本帝國國體的掌控。可是，在〈臨床講義〉的「主訴」裡，卻形塑「臺灣島」的男性身體上，刻劃妊娠紋的女體化標記。這種器官錯置的現象，造成〈臨床講義〉的文學文本，原本為台灣民族意識的論述場域，卻與日本帝國在歐戰後國際外交的挫敗與內政的更迭變化，看似發生沾黏（Adhesions）⁹⁸ 的糾葛現象。

就日本近代思潮的演進過程而言，顯然大正時期1920年代的日本，正處於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重存在階段。在日本內地，民族主義使得國家與人民團結一體，成為大正民主思潮（デモクラシー）中的認同象徵之一。在台灣這殖民新附地內，帝國主義卻讓國家凌駕人民之上，導致台灣總督府的獨裁專擅。即為台灣總督府在同化主義的外殼下，遂行「第三號法律」的專斷獨裁，成為帝國主義一貫延續的殖民政策。因此，就當時田健治郎總督期間的政治現實環境來看，上述〈臨床講義〉台灣身體與日本國體膨脹的沾黏，隱喻著「日本國民」的複雜所指，除了有蔣渭水對「國民」身份的諷刺性與借力使力的

97 台灣總督府初期的南進論述，即開拓南亞未開化的疆土，為當地帶來文明化的恩澤，當做日本人負擔世界的責任。請見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に題す〉，《台灣統治志》（台北：南天書局，1997.12），頁1。原書為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日本東京：博文館，1905）。當時大正年間，台灣已可做為日本殖民地的文明開發典範，其實業經營、製造技術、資金、原料等相關經驗與條件，足以擔任日本帝國南進擴展的基地。

98 這裡借用病理學上的沾黏（Adhesions）術語，意指台灣與日本原本各有歷史文化的演進，縱使局部的重疊和接觸，獨立性依然存在。然而，政治手術般的日清馬關條約，促成台灣附屬於日本帝國的國體下，使得日治時期台灣尋求主體性的過程，必須纏繞在歷史文本裡近代性與殖民性的雙重意涵中，即使台灣處在差別待遇的殖民地位置，亦為日本近代政治的發展所牽動。實際上，日本內地的近代民主思潮，透過東京台灣留學生的仲介，與台灣的民族運動息息相關。反之，日本帝國在國際勢力的擴張與萎縮，也影響了台灣總督府對台灣殖民政策的制訂與施行。如同Bhabha, Homi K.指出，殖民地人民經常處在『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的身份認同裡。

作用外，⁹⁹ 尚且脫離不了國家掌控下的連動關係。¹⁰⁰ 大正時期日本內地社會對「國民」的詮釋，還有「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政治上應在人民」的民本概念。¹⁰¹ 可是，台灣人民被期待馴化為田健治郎所說的「純粹日本人」¹⁰²、「帝國忠良之臣民」，¹⁰³ 卻沒有在「國民」身分上，獲得與內地相同的待遇地位。尤其，是議會設置與參與的民主權利。因此，蔣渭水才會在「日本國民」的沾黏下，戳破田健治郎其「內臺一體」的同化口號。一方面爭取殖民地的「帝國臣民」應享有「日本國民」的權益。另一方面，指出差別待遇的現況，可激發民族意識的覺醒。否則，對照同時期間（民國10年）的中華民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動亂中，讓享有近代文明甜頭且和平無事的台灣社會，很難認同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同志推行文化啟蒙運動的必要性。這也說明日本統治台灣的現況中，社會群眾運動要能萌芽，必須向困難的政治現實，做某種程度的協商或策略運用，實為必要的權謀手段。¹⁰⁴

回到器官錯置的身體敘事，〈臨床講義〉的文本讓台灣的民族身體縫合了國家體制的嘲諷象徵，反映當時看似朝向代議制與開放言論的氛圍中，實則

99 如蔣渭水在〈隨感錄——這句話非同小可！〉一文，提醒或諷刺日本統治當局認清楚國際局勢的現實面，是台灣人身為「日本國民」的權利與義務：「而今台灣人的政治運動是要促政府改善政治上的弊端，可說是一種愛國的行動了。這國民的政治運動，乃是個國民的權利，也是國民的義務啦！」《臺灣民報》2卷22號社論欄，引自《蔣渭水全集·上冊》，頁37。

100 鹿野政直：「二十世紀開始時，對很多日本人而言，國家是不辯自明的前提。不，以進入列強為目標，創建國家本身就是目標。正因為如此，民眾把自己和國家變成一體。從民眾的角度來說，就是加深作為「國民」的自我意識。……有日本國籍的人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稱呼是「臣民」，意味著大家都是天皇制底下。但是實際上，為了加強大家的一體感，面向世界時，多使用「國民。」鹿野政直著，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頁165。

101 鹿野政直：「以一九一〇年代為中心，是高倡「民主」的時期。那些主張確立以非特權階層及一般民眾為政治、文化主體的人，將他們的立論根據求諸於「國民。」，同前註，頁165；「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政治上應在人民」，則為吉野作造在大正5年1月的《中央公論》，發表〈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其の有終の美を済すの途を論ず〉一文對「デモクラシー」的解釋，引自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頁22-23。

102 田健治郎，〈大正八年（1919）十一月十二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62。

103 田健治郎，〈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二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470。

104 關於蔣渭水對民族意識的主張與現實政治環境的困難，兩者之間如何因應。學者王曉波有這樣的看法：「在殖民地台灣最被當局忌諱的當為民族思想，無論文字或演講，都將被禁止。為了思想鬥爭的合法化，蔣渭水積極主張民族意識的公開言論並不多，但卻多消極的批判殖民當局的民族同化政策，和批判民族差別待遇的政策。」，〈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蔣渭水全集》編序〉，《蔣渭水全集·上冊》，頁12；以及張深切也指出，蔣渭水對殖民政權採取「陽奉陰違」的作法「他表面上雖然承認日本的統治權，實際上卻是徹底反日的民族自決主義者」張深切，〈蔣渭水〉，《張深切全集·卷2》，頁461。

隱喻台灣總督府對本島人民無所不在的監視與箝制，以避免歐戰後民族自決與民主浪潮波及到台灣社會，影響其殖民政權的穩定。誠如，鹿野政直對國體的詮釋：「『國體』所依據的制度與精神根幹，則是以十九世紀末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教育敕語為指標。其一旦成立，滲透速度非常快。表現日本獨特國家特色的『國體』二字，是測驗忠誠度的石蕊試紙，規範國民精神的方向，具有束縛力」。¹⁰⁵此時，正值蔣渭水推動台灣文化協會之際，就必須利用「日本國民」外殼的掩護，躲藏在所謂日本帝國「國體」的忠誠保證中！¹⁰⁶

然而，這種台灣身體性別錯置的生理現象，不僅是操作「日本國民」的忠誠表態，調侃了當時日本帝國在國際上的過度擴張，遭受西方列強的壓制和排擠現象而已。¹⁰⁷最要的是，蔣渭水藉此表達其政治申論的目的。如果說蔣渭水撰述〈臨床講義〉，是指導台灣島尋求獨立人格的方向和作法。那麼台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就是促使台灣島能獲得獨立人格的實踐行動。因此，上述對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諷刺，正指涉台灣文化協會相關同志對於推動台灣議會設置的合理性與迫切性。¹⁰⁸正呼應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趣旨〉的主旨即揭示，設置台灣民選議會是日本帝國當時最迫切的意義：

今臺灣雖呈庶政興舉，地方秩序井然之外觀，但其內容則官權獨高，民意未暢。尤其歐洲大戰後，道義思想勃興，促進寰球人類甚大覺醒，國際聯盟成立，予列強之外交內治以根本的革新。最近又有四國協商及海

105 鹿野政直著，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頁6。

106 蔣渭水在〈私の主張〉（即〈我的主張〉）曾經表現這種忠誠保證下的政治訴求「如果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都與內地人平等，相信可以拯救台灣人的痛苦。要求設立台灣議會，簡言之，是在於獲得政治上的平等，不是要脫離日本的統治。」，昭和2年2月27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417。譯文引自《蔣渭水全集·上冊》，頁129。

107 田健治郎在大正10年7月18日的日記：「一、頃者米國提唱日、米、英、其他諸國全權會議，欲議兵備縮少及太平洋懸案之解決，其目的在拘束我邦之行動也，殆不容疑。對之之策，唯在主持根本義而不迷眩於其勢焰耳。支那、朝鮮及排日米人之煽揚，皆一種之勢焰也。」，《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頁258-259。

108 台灣議會設置對蔣渭水再度引燃政治熱情，從此終身不渝地推動，是極具重要關鍵，或者可說最大的動力。他曾在〈五個年中的我〉追憶：「大正十年春，在宴席中由林瑞騰氏介紹，才識得林獻堂氏……後來獻堂氏到東京和留學生聯絡，做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運動。這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此請願趣意書，映入我的眼裡，我覺得這真是臺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啊！那時我就逢人便說——臺灣議會的設置，是臺灣人唯一的活路。」，《臺灣民報》67號。因此，大正10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具體政治目標，當為推動台灣議會的設置。

軍條約之締結，因國勢之均衡，極東之和平似可確保，但民心未達安定之程度……對於臺灣之統治，務要參酌其特殊事情，借鏡世界思潮，洞察民心趨向，速予種族均等之待遇，俾得實踐憲政之常道。是即設置由臺灣民選之議員所組織之臺灣議會，使臺灣民眾仰體一視同仁之至意，均沾立憲政治之恩澤，成為善良之國民以完成其地理上、歷史上特殊之使命，此確信為帝國目下最大之急務。¹⁰⁹

五、結論

繼大正9年留日的台灣學生在東京組織成立「新民會」，創辦了機關刊物《臺灣青年》並在台灣發行流通，某種程度啟蒙了台灣社會知識分子的思想視野與國際觀。大正10年10月17日，成立台灣本土的文化社團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並於11月28日發行其機關刊物《會報》第一號。身為文化協會專務理事的蔣渭水，在這期刊物發表了〈臨床講義〉一文。在〈臨床講義〉特殊的臨床診斷書寫作格式裡，除了宣傳文化協會的正當性與其改革社會文化的遠景外，也蘊藏了蔣渭水個人的政治理想，以及對台灣總督府不當政策的抨擊。

此時的台灣總督府，如實扮演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的角色，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藉由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的設置，想要安撫台灣社會民意的高漲，並制訂內台共學與教育令的改正等一系列措施，以消弭台民對於待遇地位的差別感。這符合了他就任時，提出內台一體的同化主義口號。無疑地，面臨歐洲大戰後，國際間來勢洶湧的民族自決與日本內地的民主浪潮，對於當時台灣武力抗爭暫告平息而獲得社會秩序的穩定，恐怕再次產生激化的影響。此時，台灣總督府根據日本帝國憲法與已然擴張的帝國主義，必須形塑一種大和式的民族國家¹¹⁰的願景，將台灣這個殖民地及其人民，涵化於效忠「萬世一系」的

109 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趣意書內文，引自吳三連、蔡培火等，〈第四章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臺灣民族運動史》，頁108-109。

110 Benedict Anderson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是效仿德國中世紀裡一種變形的「官方民族主義」。由於日本皇室的獨特古老性（unique antiquity），以及它的象徵的日本屬性（Japan-ness），使得官方民族主義者意圖操縱皇室的純真性。在台灣與朝鮮相繼佔有後，刻意透過學校教育與印刷的宣傳，創造日本人是這個民族國家的真正代表之普遍印象。Benedict Anderson,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95-97。

皇室國體內，以「帝國忠臣良民」的符號來固定其位置。

然而，「民族」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政治現象、意識形態、社會運動，甚至可以擴展成尋找自身文化根源的一種被想像的共同體，如同Benedict Anderson所云「民族」是一種「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是存在每一位民族成員心靈層面的共同想像或共同事物。¹¹¹ 蔣渭水在〈臨床講義〉裡宣稱台灣的「現」住所，不過是移籍27年的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意圖以符號的書寫效果，召喚「原籍」符號的意指，暗示漢民族意識的藏匿處而作為一種抵制手段，並佈置未來的政治理想。從意識型態而言，〈臨床講義〉依附於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的刊物形式，利用文字符號的再印刷再傳播，製造殖民地自身的民族主義，意圖再現（represent）漢民族意識與文化記憶，以抵抗殖民當局強調民族國家的同化主義，及其帶來台灣的格式化（format）即被清洗與標準制式化的危險。

但是，蔣渭水如何通過〈臨床講義〉的論述，在台灣總督府製造同化的危機中，將民族認同落實為可實現的「想像的共同體」？蔣渭水必須建構與台灣文化協會同志之間一種可被理解的共同語言。依據Stuart Hall的概念，共同語言必須建立於對表徵與語詞、意義之間的互動概念，以文化符碼的形式來展現。¹¹² 就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初期的領導與地方幹部人數共44名，與蔣渭水同為醫師職業有11人，佔了四分之一。¹¹³ 這說明文化協會的醞釀到成立過程，其領導人物、中堅會員與主要幹部的組成，都與醫學生、醫師等醫界成份，發生緊密的聯繫關係。因此，由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宣本質來看，台灣總督府審查監視機制下，蔣渭水藉由〈臨床講義〉及其臨床診斷書格式，意圖在形構文化

111 「共同事物」意指，每個人擁有許多相同的事物（individus aient beaucoup de choses en commun），同時，他們也已經忘記了許多事情（et aussi que tous aient oublié bien des choses）。這是Benedict Anderson引述Ernest Renan對民族的定義。因此，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的本質，必須追溯其文化根源。Benedict Anderson, 'Introduct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4-7；「文化的人造物」的意涵，可參考註81，Benedict Anderson對文化與民族主義的連動關係之理解。

112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Great Britain: The Open University, 2007), p.4.

113 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製臺灣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與會員表統計。〈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文化協會趣意書——文化協會の陣容」，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42-146。

協會同志之間的一種共同語言中，推銷個人的民族改革理想宣言。

臨床診斷書，作為台灣新式醫學的象徵之一，透過日本醫學教育體系的仲介，正式進入十九世紀末的台灣社會。因此，〈臨床講義〉其臨床診斷書的特殊寫作格式，在本質上，就賦予了西方近代文明發展的表徵。¹¹⁴ 蔣渭水藉由臨床診斷書的體例以診治大正10年當時的台灣社會，做為台灣文化體質跨向世界性和近代性的一種權力書寫。就文學寫作的觀點，這樣的診斷書格式，在題式設計的整體流程裡，突破一般傳統文學論說的體裁，將起、承、轉、合的傳統寫作結構，內嵌於病史、症狀、診斷、處方等項目裡。另外，就寫作方向而言，〈臨床講義〉的撰述，是蔣渭水特別為「臺灣島」這位患者製作的專屬臨床診斷書，藉此呈現他對台灣社會的病理式觀察，以及提出改革方案和預計成效。

從符號的觀點來看，這種臨床診斷書的結構形式，是近代科學實證性的展示，包含辯證、邏輯等理性思維的描述成份。從「姓名」到「療法」這些符號，附著於臨床診斷書的結構上，其實質性的所指，必須寄託在符號下的描述裡。而臨床診斷書符號下的這些描述，不僅彰顯其臨床的意義（clinical significance），更指出「臺灣島」這位患者在社會態身體結構的改變。同時，指涉〈臨床講義〉其符號及描述，可能隱喻著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重要表徵「描述是尋求秩序的顯現，同時描述也尋求起源之可理解的順序」。¹¹⁵ 這說明在大正年間歐洲大戰後，面臨世界各種思潮竄與日本內地各種意識活動勃發之際，台灣文化協會必須指導已經遺忘原有文化價值且脫離世界文明時間的台灣社會，尋找適應國際間生存競爭下的新秩序、新方向。這也是蔣渭水身為台灣文化協會主事者之一，以臨床診斷書的體例格式，撰述〈臨床講義〉的深層意義之所在。

114 臨床診斷書，藉由病史、診察、病理分析、治療等記載內容物而呈現其自身，是為臨床醫學驗效的展示場域。其書寫體例，可在愛丁堡（d'Edimbourg）的臨床診察記事裡看到：「觀察包括四種系列的問題：首先是有關病患的年紀、性別、性格和職業；其次是他的徵候；第三是病源及其病程發展；第四是更遠的病因與早期傷害」請見Par Ph.Pinel, 'SECTION PREIÈRE', *La Médecine clinique: rendue plus précise et plus exacte par l'application de l'analyse* (Paris: Chez J.A.Brosson, Libraire, 1815), p.4.

115 Michel Foucault, '7. Seeing and Knowing',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reception*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73), p.114.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台灣醫學五十年》（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11）。
- 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11）（原書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14年）。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日本東京都：龍溪書舍，1973），（原書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14年）。
- 田健治郎，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史研究所，2001）。
-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史研究所，2006）。
- 白成枝編，《蔣渭水遺集》（台北：文化出版社，1950）。
- 伊藤博文，《帝國憲法皇室典範義解》國家學會藏版（日本東京：金港堂，1889）。
-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台北：南天書局，「1905」1997）。
- 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
- 李永熾，《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
- 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10）。
- 杜聰明，《回憶錄·上冊》（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06）。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沃爾夫岡·伊瑟爾，陳定家、汪正龍等譯，《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中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02）。
-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1989）。
-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出版社，1993.06）。
- 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06）（原書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14年）。

- 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 張深切，《張深切全集·卷2》（台北：文經社，1998）。
-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06）。
- 莊永明編輯，《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 連雅堂，《臺灣通史》修訂校正版（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01）。
- 陳水逢，《日本近代政治史》（台北：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1995）。
- 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台北：日創社，2006）。
- 鹿野政直著，許佩賢譯，《日本近代思想》（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05）。
- 黃師樵、白成枝編纂，《蔣渭水全集》（台北：蔣氏遺集刊行會，昭和7年（西元1932年））。
- 黃敦涵編著，《翁俊明烈士編年傳記》（台北：正中書局，1977）。
- 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
- 葉永文，《台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6.09）。
- 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編著，《臺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87.04）。
- 蔣朝根編著，《蔣渭水留真集》（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12）。
-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下冊，增訂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06）。
-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決定版〉正傳·後藤新平》（日本東京：藤原書店，2004）。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 Edward McNall Burns eds., *Western Civilizations*, Tenth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4)
- Gayatri.C.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 from the third edition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774」1970)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4)

John O'Neill, *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 (Great Britain:SAGE,2004)。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reception* (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73)

Par Ph.Pinel, *La Médecine clinique: rendue plus précise et plus exacte par l'application de l'analyse* (Paris: Chez J.A.Brosson,Libraire,1815)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

Stefan Tanaka, *Jan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

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Great Britain:The Open University,2007)

二、論文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臺灣文獻》17卷1期（1966.03）。

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成大歷史學報》12號（1985.12）。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並論1582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翰林社會天地》5期（2006.10）。

林呈祿，〈六三法的沿革〉，蔡培火等編，《臺灣青年》1卷5期（大正10年7月）。

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年》1卷1號（大正10年7月）。

吉野作造，〈祝辭〉，蔡培火等編，《臺灣青年》1卷1號（大正10年7月）。

蔣渭水，〈廣義の衛生講話〉，《臺灣》日文部之第四年2號（大正12年2月1日）。

——，〈治警事件法庭辯論〉，《臺灣民報》2卷16號（大正13年9月1日）。

——，〈隨感錄—這句話非同小可！〉，《臺灣民報》2卷第22號（大正13年11月）。

——，〈晨鐘暮鼓〉，《臺灣民報》3卷3號（大正14年1月21日）。

——，〈獄中隨筆（三）〉，《臺灣民報》61號（大正14年7月19日）。

——，〈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號（大正14年8月26日）。

Bhabha, Homi K., 'A Global Measure', presentation on the "Forum on Postcolonialism"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June 2002.

三、電子媒體

山口秀高，〈臺北醫院內ニ於ケル土人醫士養成ノ景況〉（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民政長官時代，「臺北醫院內ニ於ケル土人醫士養成ノ景況」（來源：<http://tbmddb.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2012.05.06）。

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閣下演說（台灣醫學會第一回大會）〉，《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民政長官時代，「演說及び訓旨」（來源：<http://tbmddb.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2012.05.06）。

王德威，〈大病文人醫——兩位大夫的故事〉，中國時報「時報科學與人文」專欄（來源：<http://forums.chinatimes.com/tech/techforum/040411a1.htm>，2004.04.12）。

四、其他

不著撰人，〈北警高秘第一六〇七七号台北州知事通報〉，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圖書館的內田嘉吉文庫所藏總督府檔案影印本，大正12年11月13日。

